



记忆八十九期

目录

【专稿】

李英美 清华精神之典范与文革史实之真伪
——兼评唐伟《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一文之误

【专题研究】

王 锐 中央领导层对文革小报的态度

【博士论文】

向 前 政治身份体系下的社会冲突——文革初期群众行为的社会根源（四）

【评论】

唐少杰 清华大学 1967 年 5 月“革命委员会”成立流产记

【访谈】

樊建政 复旦文革“太史公”徐振保先生访谈录

【简讯】

韦 陀 迟泽厚先生病逝广州

【检讨与揭发】

李慎之 揭发胡乔木贩卖封、资、修黑货的一些事实

【来信选登】

1、杜钧福谈唐伟文的失实 2、庄菁瑞赞贾明文 3、郭世杰纠正 88 期的人名

【专稿】

清华精神之典范与文革史实之真伪 ——兼评唐伟《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一文之误

李英美

本人业余时间研究文革，不久前，看到清华校园网上重温胡耀邦总书记和罗征启先生支持孙毓星（后改名孙耘）读研究生一事，感人肺腑。同时又在《记忆》第86期上看到原清华大学学生唐伟的文章《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孙怒涛〈良知的拷问〉读后》，令人倒胃。两相对比，真是天壤之别。在此，本人就清华精神之典范与文革史实之真伪直抒己见。

清华精神之典范

文化大革命中的1968年，蒯大富在清华大学为所欲为，极左霸道。蒯大富等把私下议论林彪、江青并对林彪、江青表示不满的原清华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罗征启打成反革命集团头子，蒯大富手下的专案组组长孙毓星等人，竟在一次抓捕行动中，误把罗征启弟弟罗征敷带走，押解途中，罗征敷不幸意外窒息死亡。当年抓捕罗征敷的行动队负责人孙毓星和王庆章、张建国同学一起承担了这起人命案的罪责。

文革结束后，特别是到了1980年，罗征启和孙毓星都处在命运的重要转折点。时任清华党委副书记的罗征启正行进在通往中央的坦途上。正如万润南先生文章所言：“他是第一批到中央党校集训的干部班班长。第一期十人，其中有田纪云和尉健行，老罗是他们的支部书记。他被安排去接任韩英的团中央书记。”

而此时的孙毓星第二次坐牢后刚刚“取保候审”。孙毓星在狱中自强不息，恶补文化课，试图通过报考研究生重新体现自身价值并改变自己的命运。孙毓星和原北航红旗二把手井岗山（后改名井然）同于1980年报考哈工大研究生。孙毓星考试名列榜首，井岗山考试成绩也很好，虽然负责招生的科研处等主管部门

很想招收，但两人政治审查都通不过。孙毓星和井岗山寻找渠道，据理力争，终于达成结论，哈工大向清华和北航做进一步调查。

孙毓星的前途和命运掌握在清华党委副书记罗征启手里，罗征启如果完全不管孙毓星的事，只要不踩孙毓星一脚就算是大恩大德。然而超出世人想象的是，罗征启竟然给黑龙江省招生办公室和省委负责同志写信，替孙毓星说好话。罗征启在信中说：

……1968年3月27日凌晨，我越狱逃跑。孙作为“专案组”组长，参与过追捕我的行动，并于4月初的一次抄家行动中，将我的弟弟罗征敷（第一机床厂工人）绑架殴打窒息致死。实际上，当时直接参加这类行动的（包括绑架和刑讯逼供）是校内一些工人和另外几个学生。但孙毓星（即孙耘）作为“组长”，在我弟弟死亡以后，就和王庆章、张建国两个同学一起，承担了这起人命案的责任，而且孙毓星被作为“首犯”。十二年来，孙两次入狱，多次被隔离审查，长期被定为敌我矛盾问题，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我认为，他是承担了较多的责任的。……

鉴于上述情况，我想，第一，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泛滥，许多青年人犯了错误，有的犯了严重错误。他们的错误，有主观上的原因，但主要的不应由他们自己来承担。第二，他们已经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代价。十二年来，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可以说和判处十二年徒刑差不多。粉碎“四人帮”快四年了，应该尽早让他们放下包袱，轻装前进。第三，他们对自己的错误是认账的。在海拉尔市解决了孙毓星的问题以后，他曾给我来过信，并借出差来京之便，到学校找我面谈过，我以为态度是诚恳的。同时，这个青年人也表现出过人的才能，他考入清华时，成绩就不错，这次在狱中复习了功课，能考出较好成绩，是不容易的。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使不少人家破人亡，使同志之间产生不少隔阂，甚至结下怨仇。我想，今天我们的国家在前进，许多历史积案陆续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的真相也逐渐清楚了，现在是化怨解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时候了。有些青年人，拉一把就可能是一个很有用的人才，应该给他

们一个改正错误，锻炼成才的机会。因此，我恳切地希望党组织考虑我的意见，重新研究是否录取孙毓星的问题。

... ..

罗征启

一九八〇年八月廿六日¹

由于罗征启的态度，清华领导决定对孙毓星放行，而北航党委仍坚持反对哈工大招收井岗山。哈工大的领导无法决定，找到当时在京开人大的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杨也无法决断，经人指点找到负责落实政策的中纪委二办，由主持中纪委工作的副书记王鹤寿汇报给胡耀邦。罗征启处理历史恩怨的态度受到胡耀邦总书记的赞赏，胡耀邦总书记批示：“人才难得，既往不咎，研究生要上，必要时见《人民日报》。”

罗征启、胡耀邦不仅对孙毓星和井岗山表示宽容和恩慈，他们对蒯大富也同样表示宽容和恩慈。蒯大富在文革中造成恶果，也同样付出了沉重代价。他获刑17年并被剥夺政治权利四年。1983年，胡耀邦总书记就说：“从前，我不赞成把蒯大富他们捧那么高，现在，我也不赞成把蒯大富他们整得这么狠。”胡耀邦本身就是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对他的功过是非也存在争议。但在处理孙毓星和井岗山读研究生问题上，在对待蒯大富的问题上，罗征启的风范，胡耀邦的批示，表现出高尚的情怀。留下动人的世间佳话。

罗征启对孙毓星等青年学生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和恩慈，而罗征启对于强势人物又如何呢？据万润南先生的文章介绍：陈云有个儿子叫陈元，恢复高考后回清华读研，当时有一个到美国留学的名额，是教育部的公派名额，已按规定走完报名、政审、考外语等步骤，陈元想通过非正常程序得到。罗征启非常善意地给陈云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文革后人心思定，对老干部非常关注，希望他们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不负众望。

陈云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做出过杰出贡献，当时位高权重。如何处理与陈云的关系对于罗征启政治前途至关重要。罗征启不以私利为计，而是秉公办事，立于正道。后来，罗征启被外放深圳，成为深圳大学的奠基人，先后担

¹ 引自罗征启信件影印件。

任深圳大学的书记和校长。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风波中，罗征启要求邓小平结束垂帘听政，让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充分行使权力。同时召开人大常委会，讨论戒严，问责李鹏政府。罗征启主张通过法制之路解决矛盾，竭尽全力避免开枪流血惨案发生。结果，罗征启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被要求离开特区。后来，罗征启对蒯大富说：“你整我的时候，大喇叭一广播，就召来几千人参加。而深圳大学决定开除我党籍的时候，要有个支部大会的程序通过，但这个支部大会就是召集不起来，大家都找借口不参加。”罗征启还戏言：“再搞文化大革命和蒯大富一起造反，就是要彻底砸烂旧清华！”

罗征启的感人故事完全可以拍成电视连续剧，或写成一篇震撼国人心灵的报告文学。万润南先生评价罗征启是“夭折的接班人”。我认为罗征启当接班人虽未成功，却丰富了“清华精神”，也可以说丰富了“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万润南总结的“推恩报怨与人善”和“仗义直斥（强权）”。罗征启先生对社会弱势和强势持截然不同态度，是清华精神之典范，其境界大度、永为师表。

文革史实之真伪

我们不能做到像罗征启那么高尚，但在研究文革时，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应该客观理性。唐伟文章《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信息量很大，对周恩来，对八月红色恐怖有新的内容，不无启示。但唐伟文章里关于文革史实的叙述大多是随口而出，似是而非。稍做核查就会发现破绽百出，谬误太多。现以唐伟文章为例，谈谈有关史实真伪的问题。本人查阅相关史料，并以不同方式向当事人咨询求证。事实胜于雄辩，可以一目了然。

1、唐伟在文章中说：“闯了祸的陈再道跟随周恩来到北京，没听说受了处分；风头正劲的王力、主持全军文革的关锋，被送进了秦城监狱。”

笔者指出事实真相：陈再道不是跟随周恩来到北京的。周恩来是1967年7月22日下午从武汉飞回北京的。在首都南苑机场受到江青、陈伯达等中央领导和群众欢迎。大约20分钟后，谢富治、王力的飞机降落。周恩来又率江青、陈伯达等中央领导和群众热烈欢迎。周恩来与王力拥抱。¹

¹ 见1967年7月23日《人民日报》。

1967年7月24日凌晨，陈再道和钟汉华、傅传作、刘丰、牛怀龙等十二位军队同志应中央之召抵京，住在京西宾馆。¹1967年7月27日，中央军委撤销陈再道武汉军区司令员职务。陈再道在中央军委主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接受批判，作了检查，后来等待安排。直至1972年7月31日复出，参加国防部为庆祝建军四十五周年举行的招待会。之后被任命为福州军区副司令员。²关锋没有主持全军文革的资格，只是成员之一。唐伟讲文革凭印象和传闻，唐伟还根本没跨进文革史研究之门。

2、唐伟在文章中说：“取王、关、戚政治生命以安军心，毛泽东要这种小手腕，只在一念之间，用不着精心谋划。”

笔者指出，1967年8月25日，杨成武在周恩来同他谈话的当天上午立刻直飞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的意见。杨成武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听罢汇报说：‘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我说：‘你马上去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我从毛泽东那里出来，给专机组打电话安排好飞机后，又回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喝了一口茶，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我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继续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泽东将记录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我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我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当晚，在钓鱼台，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他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毛泽东的指示。随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³

李英美指出：又过近五个月，到1968年1月14日，不仅有政治原因，还有别的因素，戚本禹被隔离审查。⁴

¹ 见《周恩来年谱》1972年7月24日。

² 见《周恩来年谱》1972年7月31日。

³ 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第43—45页。

⁴ 见赵无眠编：《文革大年表》明镜出版社出版，1996年10月第一版，230页。

3、唐伟在文章中说：“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论述，只是政治家们鼓惑群众的借口和驾驭群众运动的手段。”

笔者反问唐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哪里有“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论述？

笔者查证：1966年10月25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合理的。尽管群众中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¹

4、唐伟在文章中说：“保定要宝忠写的《蒯大富传》中讲：一次老蒯的父亲来校看他，他却对同学介绍这个苏北老乡是村里人。后来，我们大一辅导员上党课时讲，有的同学‘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

笔者向蒯大富咨询，蒯大富专门针对唐伟文章中有关问题写了文字材料，蒯大富说明：“大学期间父亲根本没到北京看过我。怎么可能向同学介绍我父亲是村里老乡呢？作家马镇写的《蒯大富演义》编造这么个故事，后来他专门写信向我表示道歉。保定要宝忠写《蒯大富传》以讹传讹，又把这个故事用上。作为我同学的唐伟也明白，如果真有此事，工作组整我时早就揭出来大批特批了。唐伟故意引用，心理阴暗。”²

笔者奇怪，唐伟与蒯大富交往四十多年，眼下同在深圳，为什么不打电话核实一下？是何用心？

5、唐伟在文章中说：“在绝望中绝食的蒯大富，悄悄被人看顾，来人自称受到江青同志委托。老蒯久旱逢雨，停止绝食，有了生机和继续战斗的勇气。”

蒯大富说明：“唐伟又胡编了。实际情况是，在我绝食期间，1966年7月6号，早饭前，工作组派人来问：‘蒯大富，能不能走？’我说：‘还能走吧。’然后就到了强斋工作组的一个会议室，工作人员都出去了，只留下一个人和我说话。他说：‘请坐，我叫马力，力量的力，我听说你绝食了？’我说：‘是的，他们违犯党纪国法，扣押我的信件，不让我向党中央汇报。’马力说：‘谁不让你汇报了，你写的信我们都收到了，你写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信我们都已经转了。’我说：‘那他们没有告诉我啊。’他又问：‘谁让你绝食的？’我说：‘我自己绝食的。’当时，马力担任北京新市委的副书记，他根本没提到江青二

¹ 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² 本文所有蒯大富说明的内容，均有蒯大富签字的文稿为据。

字。见面后我停止绝食。”

6、唐伟在文章中说：“蒯大富篡夺清华群众组织和‘首都三司’的领导权，既是文革乱象，更是中央文革支持的结果。”唐伟在文章中还说：“蒯大富掌控‘三司’应在清华‘三总部合并’前夕。”

蒯大富说明：“清华群众组织在群众运动中产生并重组。1966年9月23日，我和鲍长康、彭伟民作为召集人，号召成立‘井冈山红卫兵’。我是清华井冈山一把手。鲍长康是二把手、彭伟民是三把手，他们都是元老级的，非常坚定的‘井冈山人’。后来清华‘三总部合并’，我有独断专行的错误，没能与唐伟等同学很好团结，教训惨痛。但清华‘井冈山’的领导权本来就在我手里，怎么叫篡夺？”

至于‘首都三司’的领导权从来不是我掌控的，‘首都三司’的领导权一直由地质学院朱成昭等人掌控，更谈不上什么我蒯大富篡夺。”

笔者查证，宋永毅曾采访过朱成昭，他的采访回忆发表时，朱成昭已经去世。据宋永毅对朱成昭的回忆：“朱在采访中告诉笔者：他当时是实际上的‘第一把手’。当时蒯大富仍然在清华大学受压，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多次要他设法支持蒯大富，以‘减轻中央压力’，他当即派过一支地院东方红的战斗队去清华帮助蒯组织队伍。”¹

在三司成立大会前一天（9月5日）召开的各成员组织负责人（都是第一把手参加）会议上，因“地质东方红”主要负责人朱成昭安排，蒯大富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朱成昭在会上说，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形势很严重，反工作队的蒯大富在清华大学还站不住脚，至今没有一席之地。我们可以借三司成立之机，表明我们对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态度。经过反复思考和协商，最后，大家一致同意，让蒯大富在大会上领读“誓词”。由此决策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他以什么身份来完成这一圣命？协商一致的结果是，给他一个“三司负责人”的身份……²

7、唐伟在文章中说：“1966年10月6日发展壮大了的‘三司’，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十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蒯大富由中央文革点名作为红卫兵代表在会上发言。”

蒯大富说明：“1966年10月6号大会，是北航和三司共同筹备的。北航韩爱晶

¹ 参阅网络文章，聂树人：《蒯大富不是“三司”司令》网址：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7/0221/09/16239_371182.shtml

² 参阅聂树人尚未出版的《“三司”与“首都红卫兵”》书稿。

和地质学院周永章坐在主席台。大会最后一个议程，就是带领全场十万人宣誓，稿子是韩爱晶准备好的，韩爱晶把稿子递到我手上对我说：‘蒯大富，你来念吧。’

韩爱晶说明：“大会具体议程中央文革根本不知道，会前，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领导能不能来参加也不知道，请柬是我通过解放军报社负责人转呈的，没想到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及谢富治、肖华和杨成武等领导全都出席大会。大会由北航学生张庆海主持，会议最后一个议程是宣誓，会前准备好的誓词在我手上，我觉得井冈山代表北航红旗发言已经很成功，我再领誓，北航占得太多不好。蒯大富坐在我旁边。我一想，周总理虽然在清华给蒯大富平反，但他好像还是挺臭的，成立个‘井冈山’还不到一百人。让他上去，批反动路线意义更大。我就把稿子递给蒯大富。我说：‘誓词你来念吧！’蒯大富接过稿子就上前去了。”¹

笔者评议：相隔一个月，两个极有影响的大会，分别由朱成昭，韩爱晶让蒯大富在大会上领读“誓词”，足见蒯大富当时的个人影响。

8、唐伟在文章中说：“从老孙的回顾中，能看到是‘三总部合并’吗？那是蒯大富私自任命干部，拉帮结伙。当时有几个造反的头头在乎程序正义、手段光明？对蒯大富的卑劣行径中央文革却没有任何干预，我甚至猜到，其中有戚本禹的共谋。清华文革已不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大字报、大辩论时期了。”

蒯大富说明：“我有独断专行的错误，但清华井冈山成立以及总部成员名单与戚本禹无关，我也没有与戚本禹共谋。唐伟的猜想并不符合事实。”

9、唐伟在文章中说：“‘反唐’暴露了造反派头头们自伤自残的真实嘴脸。由于中央文革的干涉，老蒯也发现‘大方向错了’。‘反唐’嘎然而止。”

笔者查证：1967年2月5日，江青秘书阎长贵给清华大学井冈山总部来电话说：“我前几天来你校看了一下大字报，发现了你们反‘托派’，这是不对的，不应该把矛头指向群众，而应当指向当权派，一般同学有错误缺点应当批评帮助，反托派对本身不好，对团结也不好，请转告蒯大富。”²

阎长贵1967年1月9日开始给江青做秘书，上任不到一个月就关心帮助唐伟，批评蒯大富。而阎长贵是戚本禹推荐给江青的。³此事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

¹ 本文所有韩爱晶说明的内容，均有韩爱晶签字的文稿为据。

² 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³ 阎长贵、王广宇：《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4月，211页。

唐伟猜想戚本禹与蒯大富共谋清华井冈山总部成员名单是无中生有。

10、唐伟在文章中说：“他编出了自我吹嘘的《蒯大富大字报选编》，同学戏称之为《蒯选》。有权有钱的老蒯下令，一下子印了50万册。江青为此批评老蒯：‘你蒯大富也太狂妄了，我还没出选集，你倒先出了。’由于江青的干预，《蒯选》发行量不大，存世就更少了。”

蒯大富说明：“唐伟又信口开河了。《蒯大富大字报选编》是师大女附中老红卫兵负责人梁二同汇编印制的，梁二同是空军参谋长梁璞的女儿，一共印有二千册。江青没有对我批评过这件事，倒是关锋批评过。唐伟写文章讲述文化革命，对当时发生的事他根本不做核实，捕风捉影随口就来。”

11、唐伟在文章中说：“1966年12月‘井冈山兵团’成立没几天，蒯大富就派人去抄了徐向前元帅的家，把徐元帅的保险柜弄到清华。我参加的最后一次总部会上，蒯大富安排人连夜把保险柜运往天津用氧气割开，还说周总理下令归还保险柜的指示出了北京就不好用了。这件事似乎后来无人追究，我曾当蒯大富的面指控过他，他却没事的人一样。那么多人参加总部会，参加抄家抢劫的人也不会少，几十年来也没听说有人揭露这件事。1967年1月11日徐向前在全军文革小组改组后还担任了组长。蒯大富当时为什么这么干？为什么敢这么干？抄来的东西给了谁？”

蒯大富说明：“1967年7月28日，清华井冈山的人去徐向前的住所和办公室，抢走了装有绝密、机密文件的档案箱五个和其他材料。我已经承担法律责任。唐伟可以去看我的判决书。现在唐伟在文章中又冒出1966年12月‘井冈山兵团’成立没几天，蒯大富就派人去抄了徐向前元帅的家，把徐元帅的保险柜弄到清华的故事。请问：我从1970年10月失去人生自由，抓五一六，清三种人，检察院起诉。对我审查有若干遍，即便清华无人揭露这件事，徐向前秘书及部下也不揭露吗？最后法院能不追究吗？”

12、唐伟在文章中说：“1967年5月30日清华大学革委会流产，毛泽东说的‘蒯大富可以当清华大学校长’，成了老蒯眼前晃来晃去的画饼，也成了蒯大富终生抱憾的清华情结。”

蒯大富说明：“毛泽东谈话的时间、内容与1967年5月30日清华大学革委会流产毫无关系。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

厚兰和王大宾时，谈到清华联合问题。

毛泽东说：‘还是要联合，还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出两个，四一四出一个。’

毛泽东问：‘蒯大富，你能当清华的校长吗？’

蒯大富说：‘我不行。’

毛泽东说：‘蒯大富当校长，沈如槐当副校长。’ ”

笔者指出：唐伟讲文革是不用考证各种史料的。毛泽东召见谈话在多年前出版的《聂元梓回忆录》以及2011年出版的许爱晶编著的《清华蒯大富》一书中都有相同的记述。

13、唐伟在文章中说：“老蒯下令开枪，而且是五支同样的步枪瞄准同一个目标开枪，以逃避法律的惩处和良心的谴责。”

蒯大富说明：“请唐伟拿出证据，蒯大富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对什么人说的？又是谁去执行的？”

14、唐伟在文章中说：“尽管周恩来曲意逢迎毛泽东、谀事江青，领衔‘刘少奇专案组’组长，遭人诟病，却能时时处处表现出是无奈的违心所为。总之，老蒯对于这位最早为他平反的恩人尽管恨得牙痒，却从来不敢公开挑衅。”

蒯大富说明：“周恩来总理是我的恩人，我在文化革命中对周恩来总理的话有不听的时候，也有觉得周恩来总理和稀泥，不够劲的看法，但根本谈不上什么恨得牙痒。”

15、唐伟在文章中说：“武斗刚开始，蒯大富的恋人——清华附中刘刚就离他而去了陕北：‘这个毫无道德底线的人政治生命完了！’……‘狗熊’的革命精神和正义感还表现在另一件事情上，他知道了蒯大富占了便宜又要抛弃女友刘刚，而刘刚是他继母带来的妹妹同在清华附中高一年级班里的同学，‘狗熊’几次守候在强斋门口，准备伺机将蒯大富暴打一顿。”

蒯大富说明：“我从没想过要和刘刚分开，分手是刘刚提出来的，我不同意，时间也不是武斗刚开始的4月份，而是1968年8月初，清华武斗已经结束，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已掌管清华。到1968年底真的分手，刘刚和同学一起去山西插队。我毕业分配去了宁夏铝厂。离别时，刘刚还抄录宋代柳永《雨霖铃》的词给我做纪念：‘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方留恋处，兰舟

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待与何人说！’

唐伟文章评清华文革和校训，信口编一些故事攻击他人，硬伤太多。恰恰反映唐伟内心的阴暗。”

16、唐伟在文章中说：“明明是“二司”的‘北航红旗’，因为韩爱晶和蒯大富的亲密关系也在全国各地设立‘三司联络站’。……‘北航红旗’是保工作组的，留在了‘二司’，这也是后来‘天派’、‘地派’由来的原因之一。”

笔者查证：“事实恰恰相反，‘北航红旗’是批判工作组的，‘北航红旗’仅仅为了要见工作组组长赵如璋澄清问题，在赵如璋办公的国防科委门外附近坚持了28昼夜。直到毛泽东表态问题才解决。‘北航红旗’是主动参加筹备‘二司’，不是留在了‘二司’。这是他们的自主权。如此简单的史实唐伟都说不清楚，后来‘天派’、‘地派’的由来更不是唐伟说得清楚的。

早在1966年底，周恩来总理在讲话中列举北京左派组织时，就把首都三司、北航红旗并提，有时还把北航红旗列在前面，致使北航红旗声名大振。下面仅以上海一月夺权为证。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向全国宣布夺权是以两个历史性文件为标志。一个是1967年1月4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由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和“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等上海七个组织和外地四个组织发出。其中北京有两个组织参加：首都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¹

第二个是1967年1月9日的《紧急通告》，由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发出。其中北京有三个组织参加：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²

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你们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

¹ 上海《文汇报》1967年1月5日。

² 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1967年1月9日。

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¹

17、唐伟在文章中说：“江青指使韩爱晶挑起了一场北航‘红旗’和地院‘东方红’的武斗，韩爱晶趁乱把彭元帅抢到了北航。韩爱晶下令不许任何人与关押在地下室的彭元帅谈话，不断地批斗，不断地折磨他，”

韩爱晶说明：“实际情况与唐伟写的完全相反。1966年年底，在周恩来、江青等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例会上，一件事一件事地议，有人提出彭德怀在四川有活动，应弄回北京。当场议定派红卫兵把彭德怀弄回来。会后由戚本禹落实。上述情况是我出狱谋生期间先后见到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戚本禹，听他们说的。

另据曾担任过江青秘书的阎长贵先生在《记忆》87期文中说：‘……首先是我奉戚本禹之命（当时我认为这不是什么戚本禹的命令，觉得他再狂——戚本禹在文革中确实很张扬——也不敢下这样的命令，我诚心诚意地觉得这是执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去找朱成昭，朱派人去成都做这件事情……’

1966年底，一次开会，戚本禹对北航红旗二把手井岗山（现在名叫井然）说把彭德怀弄回来批判，井岗山回校给我说了。当时学生大多到外地串联去了，北京形势又特别乱，彭德怀是距文化革命七年前就被打倒的‘死老虎’，与当时现实斗争没有直接关系。我们也没顾上安排这件事。戚本禹又给我打电话，很不高兴，批评说：‘为什么还不派人去把彭德怀搞回来？’我和井岗山商量找人去四川。正巧有两个红旗战士从成都串联回来，找我们想谈谈那里的情况。我和井岗山当即要他们返回成都，落实中央文革布置的任务，把彭德怀抓回来。我们并不知道地院王大宾等人早在成都办这件事。我都没来得及问问派去的学生姓名和班号。直到若干年后，我恢复自由，到北京又打听他们是谁。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当年战友间的信任和理想的纯粹，但同时也可以看出，20岁出头的青年对残酷的政治斗争并无多少认知，只有热情，甚至热血。

对江青也要实事求是，江青对我无任何指示，江青也没有挑起武斗。我们派去的学生，打回电话说抓到彭德怀了，正准备往北京带，地院‘东方红’战士开卡车来把彭德怀抢走了。我立即向中央文革汇报，上面让共同把彭德怀带回北京。彭德怀就被带回北京了，开始关在地质学院，后来又被带走，由北京卫戍区负责

¹ 《人民日报》1967年1月11日。

关管，彭德怀从未在北航关押过一天。根本谈不上关在北航地下室不断地批斗，不断地折磨他。从1966年底到1967年7月18日，彭德怀回北京这七个月，我从未见过彭德怀，我没兴趣也没时间去见他。”

18、唐伟在文章中说：“还亲自动手煽彭德怀元帅耳光。”

韩爱晶说明：“唐伟说我还亲自动手煽彭德怀元帅耳光。唐伟此话属实，这是我的罪过。文革中，我只见过彭德怀一次，时间在1967年7月19日下午。‘煽彭德怀元帅耳光’即发生在此次见面。我说明一下此事的原委：1967年7月7日，毛泽东主席指示要批臭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后，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关锋、戚本禹以及杨成武、傅崇碧等先后召集会议，布置大批判，不仅要批判刘少奇，还要批判彭德怀、彭真、罗瑞卿等。于是，彭德怀被拉到北京各军兵种及一些大学批斗，安排有几十场批斗会。当时戚本禹布置我，让彭德怀写几句话，要他向毛主席认罪。傅崇碧说北航大批判也要出经验。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负责人王广宇还专门送来彭德怀反对毛主席的材料。据戚本禹前几年对我讲，拉彭德怀出来批斗都必须经过周恩来总理同意。

为完成戚本禹布置的任务，1967年7月19日下午，在北航开了一个小型批判对质会。卫戍区几个干部押着彭德怀，我们学生还请文革前北航党委书记参加，他原来是空军干部，1959年参加过军委批判彭德怀的会，让他质问彭德怀。会上大家向彭德怀批判质问，也问不出什么名堂。我急于完成中央文革小组布置的任务，要彭德怀承认反对毛主席，向毛主席认罪。彭德怀不承认反毛主席，他说他还反刘少奇呢。对于这些涉及党内斗争的问题，我知道的很有限，但我当时认为，彭德怀说毛主席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对毛主席讲：‘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娘不行？’彭德怀还说：‘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早就要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军队来’。我要彭德怀向毛主席认罪，他不认，我火了，说：‘你骂毛主席还不认罪！’我打了他一个耳光。别的学生也有动手的。当场，北京卫戍区负责押送彭德怀的几个干部就把彭德怀带走了。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其他学生的行为和责任争议太大，这里不作说明，反正法律责任已都由我承担了。后来我被以反革命杀人伤人罪等理由判处15年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笔者认为，关于彭德怀挨整是一个重大政治课题，情况相当复杂，本人打算做进一步调查研究。彭德怀挨整和文革时刘少奇等人挨整还不能等同，彭德怀是1959年被定为反党分子的，主要责任在当时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和邓小平七个常委。

文化大革命中彭德怀挨整，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人有严重责任，而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最为恶劣。审理林彪、江青两案的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王文正在一篇文章中说：“……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批斗彭德怀，被斗的还有彭真、陆定一、薄一波、黄克诚、谭政、罗瑞卿等……在批斗时，有个灵魂丑恶、公报私仇的将军跳出来对彭德怀说：‘你认识我吗？我就是差点被你枪毙的人！’说着就朝彭德怀左右开弓，狠命打了几个耳光，接着又猛踢一脚，把他踢倒在地。这时，彭德怀才想起来了，他怒吼道：‘我认得你，你在朝鲜战场上是个怕死鬼，我是差点没有枪毙你，我当年应该毙了你！’¹

身为特别法庭审判员的王文正，不但不依法追究这位公报私仇的将军法律责任，直到审判过去二十多年了，2005年才写文章披露这件事，文章仍然隐瞒公报私仇的将军姓名。而今天的网络时代早已无法隐瞒，公报私仇的就是文革时期北京卫戍区副司令的李钟奇。

而网上另一段文字介绍说：“文革中曾在北京军区举行过批斗彭德怀的大会。在大会休息时，有一个人冲进关押彭德怀的小休息室，恶狠狠地将彭一拳打倒在地，而且真的踏上了一只脚，并且还叫喊道‘彭德怀！你也有今天呐！’。同一次会上，还有一个人把便纸篓当高帽子扣到了彭德怀的头上……第一个人是当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的李钟奇将军！第二个人是姓王的中将！”

彭德怀长期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那情况就更为复杂更为严重。

19、唐伟在文章中说：“韩爱晶的好友告诉我，韩爱晶在给中学老师的信中对彭元帅充满敬意。”

韩爱晶说明：“1959年彭德怀被定为反党分子，当时我13岁。学校党团组织及政治课都说彭德怀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1964年我18岁，到北京读书，大家都写信给母校报喜，说国庆节见到了毛主席。我决心献身共产主义，要求加

¹ 王文正：《我了解的彭德怀元帅之死》，载《世纪》，2005年第5期。

入共产党。我干嘛要给中学老师写信对反党分子彭德怀表示敬意呢？我的哪位好友？四十多年还不忘造谣且落井下石！要真有此信，彭德怀平反前我多次挨整还不早告到专案组去了。”

笔者查证：1966年7月，工作组整韩爱晶时涉及过韩爱晶议论元帅的问题，但那不是彭德怀，而是陈毅元帅。工作组把韩爱晶划为四类，在黑材料里说韩爱晶对周围的人讲，陈毅性格豪爽，想给陈毅写信，要转学去外语学院读书。另外，揭发韩爱晶说过，不能要求陈毅像我们一样称呼毛主席，他可以叫“老毛”。

20、唐伟在文章中说：“就这么一个不缺少见解却毫无人性、人格的‘红卫兵领袖’，不仅受到毛泽东称赞，说韩爱晶是一个有希望的人。”

韩爱晶说明：“毛泽东主席讲这个话的时候，我并不在场。但我可以肯定，毛泽东的谈话与我斗彭德怀毫无关系。”

笔者认为，批斗彭德怀出问题是韩爱晶执行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指示造成的，已经承担责任。但这一件事并不能代表韩爱晶在文化革命中整体表现。更何况，北京航空学院师生员工们素质很高，从1966年6月开始，北航学生只停课一年。1967年5月20日，北航革委会宣告成立，韩爱晶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其后，十七级以上干部大多都结合在院系两级革委会工作。1967年7月1日，北航革委会宣布《关于复课闹革命的决议》。早在1967年初，北航就开始为海军生产装备并保质交货。同时进行无人驾驶飞机发动机研制工作，后来取得成功。社会上那么乱，北航的校舍及科研设施完好无缺。毛泽东对北航情况满意，因此表扬。

21、唐伟在文章中说：“编写《清华蒯大富》的韩爱晶，造出了一个他和地院王大宾在1968年5月30日后，受北京市革委会委托，到清华找沈如槐协调两派大联合，被沈如槐拒绝的故事。……韩爱晶在说谎。”

韩爱晶说明：“唐伟真是好笑，我干嘛要说这个谎？我对清华文革态度是一贯的，早在蒯大富打托打唐时我就表示过异议，1967年四月，听说清华有分裂的危险，我们北航主要头头五六个人一起赶到清华。在校园里看到与蒯大富意见不同的学生在游行，我听他们说蒯大富做检查，我很感动，当场我还鼓掌了。我们到井冈山总部，蒯大富和十几个头头正在开会。我发表意见说：‘让批评意见充分表达，主动做检查。无论如何不能把群众打成逆流，不能分裂。’蒯大富等

头头很客气。清华筹备成立革委会时，我劝蒯大富团结414，要让步，让414当副主任，把清华革委会成立起来。

后来，为了陈楚三的事，我急得给蒯大富打电话说：‘老蒯啊，冲着陈楚三的身世，不要整他了！何必呢？’蒯大富听不进去。清华武斗升级，1968年5月是我在北京市革委会会议上提出由干部、军人，工人、农民和大学红卫兵组成调解组，有北京市革委会议记录在，我本人参与调解活动，去过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证据会越来越多。”

22、唐伟在文章中说：“‘西纠’、‘东纠’的崛起，刺痛了清华附中卜大华等‘老’红卫兵的自尊自大：他们算老几？居然骑在我们头上纠察我们？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101中学等海淀区的红卫兵骨干发起成立了‘联动’——‘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笔者就此向卜大华先生请教。兹将卜大华先生的回答摘录如下：

李英美：你好！

……你所说的那个所谓“西纠”和联动的成立理由的奇怪的逻辑，恕我孤陋寡闻，至今闻所未闻。西纠成立于1966年8月下旬，大致在同年12月初解散，而联动于同年12月5日才发表《成立宣言》，12月26日召开名为《破私立公》的第一次大会，两者在时间上几乎没有交集。两者成立时的背景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变化，所以此二者之间很难存在你所提到的那些矛盾。顺便问一下，这些不着边际的东西登在《记忆》的哪一期？从此议题来看，文章是那种对这些问题有所涉及，而又不得其门而入的人所作，

……

卜大华

2012.9.29¹

唐伟的文章，正如卜大华评价的，是那种对这些问题有所涉及，而又不得其门而入的人所作。社会上搞伪科学的冒牌专家大多采用这种方法亮相，云山雾罩、玄之又玄。贩卖这种货色的人，有时还得到媒体吹捧，有时还能赢得满堂彩，但

¹ 卜大华回复李英美电子邮件。

他们推销的赝品经不得鉴别，尤其经不住时间考验。正如一位清华校友切中要害的批评：“唐伟图得嘴头痛快，丢弃了‘厚德载物’的校训。”笔者跟在唐伟后头核实纠正，既是针对唐伟这篇文章，也是针对史学界的歪风。

也说清华校训

唐伟在文章中谈清华校训。首先说的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自然说到王国维先生。笔者对王国维先生做学问的精神与实践是非常钦佩的，但从政治上讲，王国维乃满清遗老，他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1924年，冯玉祥部“逼宫”，命溥仪迁出紫禁城。王国维随驾前后，艰难困辱。王国维在1927年6月2日上午，告别清华园，到颐和园内的鱼藻轩前，自沉于昆明湖。对于王国维的死因说法不一，但有一条可以肯定，王国维先生是抱着对大清王朝和溥仪皇帝尽忠至死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而去的。这恰恰是笔者不赞成的，也恰恰说明王国维先生难有超脱时代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这是清华学子应引以为训的。

唐伟文章中说：“民主、科学只是时髦的口号，‘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了最有广告效应的‘烂尾楼’，值得我们年年凭吊。最迟钝的知识分子都看到了赤县神州遭逢的‘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看看真实的历史吧：学生运动只是‘五四运动’的表面浪潮，深层涌动的是纷繁复杂的直系、皖系军阀之争，亲日派、亲英美派的政客之争。‘五四运动’后，北大校长蔡元培引咎辞职，内疚自己未能保护好学生。”

笔者认为，唐伟的说法极端片面。1919年1月18日，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巴黎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而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京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这是“五四运动”爆发的主要原因。唐伟赶时髦，极力否定热血青年关心民族命运的历史价值，企图否定“五四运动”，全盘否定新文化运动。这种历史观是极端片面的，错误的。

唐伟在文章中还说：“总结清华文革教训，应该知道学生参加群体事件绝非

好事，不管社会哪种势力竭力鼓噪，为学生前途着想，校长、教师抵死也要把学生阻拦在校园之内，”

请问唐伟，难道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东三省，校长、教师抵死也要把学生阻拦在校园之内吗？那么校园里的学生还有什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呢？

唐伟在文章中说：“辛亥革命、四九年建国，都没有为多灾多难的国家 and 人民开启通往文明富强的康庄大道。”

笔者认为，社会发展不可能有一条现成的光明大道笔直通往未来，更不可能有个魔法让人民转眼间生活在文明富强的乐园里。而辛亥革命、四九年建国，恰恰是为多灾多难的国家 and 人民开启了通往文明富强的康庄大道。至于后来出现的曲折和失败，正是我们要探究的历史课题。我们就是要总结教训，寻求尽可能理想而又现实的新路。唐伟企图否定辛亥革命和四九年建国的伟大历史意义，注定要受到历史的嘲笑。

唐伟在文章中还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团、四两派鲜血写成的恩怨情仇难以消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被利用的、有罪的学生被判重刑，而巨凶首恶的僵尸依然被万民膜拜；老邓的‘宜粗不宜细’，陈云的‘两派都不用’，成为了社会禁绝反省、抛弃公正的毒瘤。被染上这种病的人，再也无法坦然面对人生。”

笔者认为，唐伟的这段议论无论是语言还是思想都极为混乱，唐伟把涉及毛泽东、邓小平和陈云的历史地位与功罪是非的重大课题做如此片面的综述是不准确的，也是不严肃的。这段议论所表达的因果关系也是逻辑不通的。什么“成为了社会禁绝反省、抛弃公正的毒瘤。被染上这种病的人，再也无法坦然面对人生。”简直莫名其妙，不知所云。

唐伟在文章中说：“毛泽东的治国之术就是‘外儒内法’的帝王术。”

笔者认为，即便用“外儒内法”来概括中华民国以前若干朝代的帝王统治术也是不准确的，而且是存在极大争议的。唐伟说毛泽东的治国之术就是“外儒内法”的帝王术，更是离谱。毛泽东坚持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能说毛泽东的治国之术是“外儒内法”呢？在社会学和史学领域，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有了列宁创建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之后，不管它成败是非如何，都必须用更新的理论去观察分析。唐伟用一个格格不入的“外儒内法”来概括，根本不准确。

唐伟在文章中说：“清华的教改经验是中南海痞子总店没有受到任何干扰，直销过来的毛泽东教育思想，是教育领域里的样板，简称‘六厂二校经验’。”

笔者反问，当时的中南海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地，唐伟说中南海是痞子总店，那么下面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是什么分店？广大党员和政府工作人员是什么？唐伟辱骂的不仅仅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唐伟辱骂的是全中国广大党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唐伟用这样一种语言来叙述历史，能说是严肃的负责的吗？

唐伟在文章中说：“迟群是个痞气十足的烂仔，小谢只是后宫嫔妃、答应中比较能认字的人，”

笔者认为，唐伟可以对历史人物的错误进行批判，但要有事实根据。请问唐伟，说谢静宜是后宫嫔妃，有什么证据？唐伟对毛泽东和谢静宜进行人身攻击，在法律上、在道德上是负责的吗？谢静宜健在北京，如果谢静宜起诉唐伟诬陷罪，唐伟会如何？

唐伟在文章中说：“……为了把人心中最强烈的欲望和最狠毒的仇恨煽动起来，毛统帅号召全国大夺权。”

笔者认为，1967年1月，毛泽东号召全国大联合夺权。如此重大的决定，按理讲应该召开中央委员会至少应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同时也应该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至少召开人大常委会讨论。原来正在掌权的官员为什么要交权？夺权者又凭什么来夺权掌权？这样夺权后果是什么？当时中央其他领导有何反应和呼应？毛泽东号召全国大联合夺权的是非如何评价？我认为对此进行研讨是必要的。

但不能简单地说毛泽东号召全国大联合夺权目的就是为了把人心中最强烈的欲望和最狠毒的仇恨煽动起来。

唐伟在文章中说：“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乏善可陈，他虽然就学于师范，也算一个有旧文化底蕴的知识分子，却对知识分子、尤其是大知识分子有着刻骨的仇恨，……”

笔者反问，钱学森和李四光是不是大知识分子？毛泽东对他们关爱备至。毛泽东在自己生日小宴上特别请钱学森坐在自己一桌，怎么能笼统地说毛泽东对大知识分子有着刻骨的仇恨呢？而钱学森在晚年仍然认为毛泽东思想不能丢。钱学

森也应该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权利。对毛泽东执政期间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认真总结是必要的，但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

唐伟在文章中说：“周恩来是何等聪慧精细的人物，他长于未雨绸缪、枉尺直寻，总能棋高一着化解危局。他痛斥蒯大富‘智擒王光美’的卑劣伎俩。对于蒯大富这个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毫无信誉的权迷，周恩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

笔者反问，唐伟说周恩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周恩来也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毫无信誉？

唐伟在文章中称胡锦涛为“涛哥”，还说：“……每一个人都自带风水命数”“……他们来自掌权痞子的身边，有如来自奈河桥那边的牛头马面。”“……老蒯的‘铁哥们儿’公安部长谢富治。”

笔者认为：唐伟运用这样的语言，极端不严肃不严谨，好像在写小品，又像是写脱口秀台词。唐伟的文章采用的是“添加剂文风”，“垃圾文风”，它的欺骗性、危害性极大。可以断言：不抛弃这种文风，不可能有严肃的史学。

唐伟文章起于孙怒涛出的一本书《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孙怒涛在文革中曾担任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414总部的二把手。孙怒涛的书，未必是传世精典，拷问也未必处处恰当。当今中国，私欲横流，弱肉强食，竟然还有人傻乎乎拷问自己的良知？竟然还有人严于责己而不是漫骂他人。正如一位清华校友所言：“人们的反思始于微观、始于自身者少而又少，孙怒涛的‘拷问’就弥足珍贵了，在我们周围恐怕是第一位，至少对清华学子们有一定示范作用。”唐伟口头上主张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竟然连孙怒涛或其他人写书的见解都必须与他保持一致，才不失望，如此霸道，还谈得上什么独立精神，还有什么自由思想！

唐伟谈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1914年冬，周诒春邀请梁启超先生到清华演讲，梁启超以《君子》为题，引述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及“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勉励同学。周诒春遂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清华校训。

唐伟在文章中自己承认：“我曾偏激地说过，只讲天道、地道而不讲人道的知识分子是伪君子。”这句话比较清楚地表明了唐伟对清华校训的理解程度。

笔者也涉足过易学。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古代天日

不分，有解天即太阳，而太阳光芒普照，恩惠无边，这就是天道。坤卦，《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地承载万物，包容无穷，这就是地道。清华学子如果真的以天道和地道自勉，虽不能像太阳那样光芒普照，也可以在社会上奉献温暖，善待他人。虽不能如大地承载万物，也可以在社会上对持不同意见者有包容之心。梁启超、周诒春之校训岂会不讲人道！笔者认为，真正弄明白天道和地道也就明白了最高的人道。唐伟恰恰不明校训真谛，不明先哲用心。

研究文革，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见解去评判是非，但绝不能凭个人好恶选择道听途说的传闻，更不能编造历史。对失败的历史人物也要实事求是，这不仅是史学界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里讲，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王国维先生之见对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极有指导价值。尤其是第二境，“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研究历史，就要学习实践王国维的治学精神，下功夫去做核实考证工作。唐伟不止一次在文章中对韩爱晶进行人生攻击。唐伟说：“在深圳饭局上，凡是见过韩爱晶猥琐表现的清华校友……”唐伟说在饭局上，别人吃饭时，韩爱晶却拿着本子忙着做笔记。

笔者认为，韩爱晶作为一个文革参与者，现在转变角色做一个文革研究者。见到当年参加文革的朋友，韩爱晶无心吃饭，抓住机会去搞清几十年前的一些历史细节。韩爱晶这样做有什么可指责漫骂的呢？你唐伟在文章中不也说“…做学问，须钻研更须积累，‘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吗？”

文革史实，浩瀚如海；周易之理，博大精深。本文崇尚的，罗征启身体力行的，胡耀邦赞赏的，清华校训宏扬的是同一个精神，那就是推动伟大的中华民族走向文明进步的精神。奉献温暖，包容善待他人。本人诚心希望能和研究文革的朋友们一起，坐冷板凳，钻故纸堆，耐得寂寞，老老实实调查考证，老老实实做学问。

2012年10月16日

【专题研究】

中央领导层对文革小报的态度

王 锐

文革小报的兴起、发展和泛滥，如同当时全国城乡无处不有，甚至一度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一样，是“文革”时期的一个特殊现象。也如同大字报一样，其从诞生到发展，再到衰亡的过程，既有其自身规律，也有着一些客观的因素在其间起着重要作用。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对待文革小报的态度，也是其中因素之一。不过，在对时局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中央领导层中，对待文革小报的态度是大不一样的。比如，周恩来与江青、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之间，区别就很明显。而毛泽东的态度，则明显倾向于后者。

1、周恩来坚持内外有别的原则

事实求是地讲，文革初期，在对待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所谓“四大”这一关键性问题上，以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为首的中央领导层，同毛泽东是存在着一定分歧的。其立足点，基本认识和考虑，以及达到什么目的和效果，如何掌握尺度等方面，看法都不尽相同。尤其是大字报问题，一开始中央领导层态度就很不一样。文革的火刚点起来，周恩来曾在多个不同场合，强调搞“四大”应当坚持“内外有别”的原则，提出对大字报要做几条规定。

1966年6月1日，毛泽东决定向全国广播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之后，北京及全国各院校立即形势大乱，局面严重失控。在此情势下，刘少奇于6月3日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出席。会上，鉴于北京及全国文革运动的新情况和新动向，拟出关于运动的“八条规定”。其主要内容有：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注意保密；不要搞示威游行；不要串联；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不准打人侮辱人等。¹毛泽东后来对这个以“内外有别”为主要内容的“八条规定”，作了严厉批评指责，认为

¹ 《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

是“压制群众”（刘少奇、邓小平、也被因此扣上“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被批判打倒）。

而文革小报的兴起，就其内容形式，发散的范围等方面，在其基本立足点上，恰恰是与“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注意保密”等原则立场，有着根本性冲突。从这个角度讲，周恩来对文革小报的一些做法，内心里肯定是不赞成的，甚至是持否定态度的。只是鉴于中央文革小组尤其是毛泽东本人对小报持肯定甚至赞赏态度，他因之不便公开反对。但涉及到一些具体事例时，他往往又要是婉转或者是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否定性意见和看法，对红卫兵造反派小报的某些搞法提出批评反对。

最典型的是，1967年夏天，周恩来在接见某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中，就特别讲到文革小报上所刊出的内容，一定要注意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不能随便将党和国家的机密档案和内部讲话，不负责任地登载小报上，而造成泄密事件。周总理还特地讲到外交部等部门反映给中央的一个情况作为例子。周恩来说，前些时候，首都的一份小报，将所谓《二月纲领》全文刊载在小报上作批判材料。该小报在北京街头公开叫卖销售时，被一个日本记者以人民币2分钱买了去。结果带回日本，转手就以1500美元的高价卖给了日本某机构。¹周恩来强调说，当时这份《二月纲领》中央并没有公布，其内容仍然是保密的，因此有外国机构愿意出高价将其买去。而我们小报在不知不觉间就泄了密，弄不好将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损失。

这是周恩来对红卫兵造反派小报不负责任的做法，批评得最严厉也最为直截了当的一次。而当时的情况是，各类小报所刊载的内容，触及党和国家甚至是核心的机密，已经越来越多，而且涉及的面也非常广，情况十分严重。

周恩来在另一次讲话中，也谈及红卫兵造反派小报被境外反华势力高价收购和利用的情况。他批评当时已越来越严重的武斗现象，说：“和敌人打仗死了才重如泰山，打内战死了轻如鸿毛，比鸿毛还轻。”又说：“与敌人有害的我们就做，无害的就不做。刊登死尸的小报两百美金一张。同志们想一想，你们不要来北京贴有利于敌人那样的大字报和照片。你们组织那么多，有没有坏人利用呢？”²

¹ 《红旗通讯》第45期，首都红代会北京外语学院红旗编辑部、红卫兵上海纺织工专平型关军团通讯组，1967年9月15日。

² 《文革动态》第5期，上海市卫生系统红色造反总部、红医兵团编辑部印，1967年9月16

的确，在红卫兵造反派眼里，可能除了军事国防机密外，恐怕没有什么内容它不能登的！不管是中央绝密级的文件，还是毛泽东及其它高层领导的内部讲话，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记录，以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个人历史档案材料，统统都写进大字报里，也上了文革小报。而这些可称为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东西，许多都是红卫兵造反派靠抄家，搜查办公室，甚至撬保险柜而非法获得的。其时，不仅一些省的省委书记、省长，中央的部长被抄家，甚至连国务院副总理（如谭震林），军队的将军元帅也有被抄家的。“七·二〇”事件后，徐向前元帅被打成陈再道的后台，也因此多次被红卫兵造反派抄家。有次抄家，徐帅住处的几个装有军事机密档的铁皮保险柜也被抄家的红卫兵搬走。事情反映到周恩来那里，周作了严厉批评，强令将其原封退还才保全了保险柜中的档材料。

正由于此，各类文革小报就成了包括海外情报机关在内的一切外国驻华机构，西方记者，中国问题专家等青睐并重点搜集的对象。当时驻北京的各驻华使领馆以及文化、商务机构人员，以及外国记者每天首要的一件事，就是派专人上街收购当天新出的各类红卫兵、造反派小报，及文革传单、资料等，然后送回国内分门别类整理研究，并据此分析中国文革形势动态和走向，中国高层斗争动向，以及其它感兴趣的内容。

也由此，文革小报的一些内容，也往往很快出现在西方通讯社的新闻稿以及报纸版面和电视节目中。这些报导，常常令中国政府感到很被动，中央高层也觉得很恼火。

因之，无论大字报也好，文革小报也好，周恩来始终坚持“内外有别”的原则，不能容许一些红卫兵造反派因出风头或其它目的，造成严重泄密事件，给党和国家的形象和利益带来不必要损失与危害。可惜，当时由于中央文革小组，尤其是毛泽东本人对红卫兵造反派的倚重，以及他本人对大字报与造反小报所持的赞赏肯定态度，周恩来这番努力并未产生多大效果。各式小报上，也一度充斥着各类带机密性质的内部讲话，高层档案材料以及党政军其它一些内容，客观上造成泄密现象仍是层出不穷。

2、中央文革小组将小报视为自己控制的“第二舆论”

日。

与周恩来态度截然不同的是，当时深得毛泽东赏识与信任的中央文革小组那一帮人，如同对文革大字报一样，对文革小报的心思和态度却大不一样。其时，中央文革小组被视为党中央（主要是毛泽东）领导和指挥开展部署“文化大革命”运动进程的总参谋部，很为毛泽东所倚重。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为核心的中央文革小组甚至能左右毛泽东的观点和意见，大权在握。有些时候，不仅周恩来，连指定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副统帅”林彪以及叶群等，也得对其“礼”让三分。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央文革小组曾一度左右着中国政治形势的大局。

文革之前，陈伯达兼《红旗》杂志的主编，控制着这份党中央的理论刊物。文革之初，陈伯达又奉中央之命带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夺了《人民日报》的权。1967年1月初陶铸被打倒后，毛泽东于1月8日直接任命王力为中央宣传组组长。至此，中央的舆论大权实际全控制掌握在中央文革小组一帮人手里。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一些重要文章和社论，以及宣传方面一些重大举措，有时连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也不知情，都是社论文章见报后才知道。而陈伯达，甚至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笔杆子”，都是只直接对毛泽东负责。

当时，党报党刊还是有相应的一些规矩和规定，比如，对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的党政军领导人以及文化名人，就有严格限制。而红卫兵、造反派办的小报却不同，如同校园或街头的大字报一样，红卫兵造反派们可以在小报上点名道姓攻击任何一个人，从国家主席刘少奇、党的总书记邓小平、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到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军队的元帅、将军，无一没在小报被点名批判。而且是任意罗列“罪状”，编造事实，无限上纲，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怎么骂就怎么骂，以此来制造打倒对方的舆论，对被打倒攻击物件形成舆论压力，对普通大众则施加心理及社会舆论压力。最主要者还在于，小报上的攻击性内容和言辞，无论怎样出格，怎样严重歪曲事实，它却可以不负责任，不承担任何后果。

红卫兵造反派小报所具有的这种特点或者说“优势”，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组发现，并成了其可以趁机利用的工具。特别是当中央文革小组暗中充当了“首都三司”的后台以后，北京几大有名的红卫兵组织，即成了江青等一伙人所操纵利

用的工具。所谓首都几大学生领袖及其手下骨干，则充当了他们攻击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以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的打手，而这些组织控制的红卫兵小报，则成了中央文革一伙人掌握控制的“第二舆论”。从文革的实际情况看，以“首都三司”的《首都红卫兵》，以及清华大学《井冈山》、北京大学的《新北大》、北航的《红旗》、北京地质学院的《东方红报》、北师大《井冈山》为主的首都红卫兵几大主流小报，在攻击打倒刘邓为代表的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问题上，确实起到了“急先锋”和“马前卒”的角色。其为此制造露骨、疯狂甚至是很恶毒攻击的舆论，在中外报刊史上都是罕见的。

早在中央还未对刘邓问题定性，更未作公开点名前，北京红卫兵的文革小报上，就开始对其进行指名道姓地攻击和批判。正如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在一次会上针对北京南下四川的学生在成都街头散发攻击刘少奇的传单，张贴打倒刘少奇大字报时所说：“刘少奇现在还是国家主席，要是在以前，就凭你喊打倒刘少奇这一句口号，就可以定成现行反革命给抓起来。”可是现在是文革非常时期，有中央文革小组（甚至是毛泽东）作后台，红卫兵们有恃无恐，在大街上喊打倒刘少奇喊破嗓子，也没人敢动他一根毫毛。政治斗争的需要，是非就这样被颠倒了，法律也就这样被无情地践踏了。

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迫于压力，刘少奇、邓小平先后在会上作了公开检查。中央工作会议于10月28日结束。10天之后，曾经贴出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又带头在北大校园贴出《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字报，指名攻击邓小平，再次在北京引起轰动。不久之后，聂元梓这份大字报就刊载于红卫兵小报上，这是继点名攻击刘少奇之后，第二个在小报上被公开攻击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此风一开，如同洪水打开了阀门，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大字报和文章在小报上源源而出，除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先前已遭点名攻击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之外，从朱德、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元帅，到副总理的陈云、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以及老资格领导人李立三、张闻天、王稼祥等，无一不被点名攻击批判。甚至连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第一顾问，被列为中央“第4号人物”的陶铸，在正式被打倒之前，也在小报上被公开点名攻击。

据笔者搜集到的资料，从1966年底到1967年4月，短短几个月时间，在红卫兵及造反派小报上发表的攻击邓小平、陶铸、朱德、陈云、贺龙、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谭震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所谓“重头文章”就有好几十篇。

不仅如此，红卫兵造反派的小报，还可以将当时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在各种场合的讲话和表态，在第一时间迅速公布和传播。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尤其是江青、康生等人）要想攻击或打倒什么人，只要随便讲，自然就有人当传声筒以“中央首长”对XX的表态公之于众，此人也立即会成为“全党共攻之，全国共讨之”的攻击头号目标。如果此时没有最高层领导（比如周恩来甚至毛泽东本人）出面强力干预或制止，被攻击者就会面临“打倒”、“垮台”，甚至身陷囹圄的严重后果。陶铸、王任重、刘志坚、肖华等当初在文革早期也曾身居高层，算是风云一时的人物，莫不是被中央文革一帮人以这种“突然袭击”的方式而倒台遭难的。其间，红卫兵造反派的大字报和文革小报，均发挥了官方舆论所无法发挥的重要作用。由此，文革小报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央文革以及林彪一伙人可以控制利用，操纵舆论的重要工具，成了他们操纵、控制的“第二舆论”。在一度时间内，个别有影响（尤其是首都及上海的几大主流小报）的红卫兵造反派小报，也确实起到了这样的特殊作用。

如今回头来看，文革小报所具有的特殊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也正在于这些地方。

3、江青讲话称“红卫兵小报办得好”

在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是陈伯达，江青是第一副组长。其实，由于江青的特殊身份，中央文革小组的实权，一直是被江青掌握控制着，很多事都是江青说了算。由此，文革中，江青的讲话和表态，都被认为“分量很重”，在中央高层，似乎仅次于毛泽东和林彪，甚至超过处于“第三号人物”位置的周恩来。

关于小报，江青在1967年1月下旬有过一次讲话，就很具体地表明了当时对红卫兵的态度，以江青当时的身份和地位，她这番表态，实际代表了权力极大的中央文革小组。

1967年1月22日深夜到23日凌晨，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

康生、江青、王力、关锋等，代表中央召集了部分北京高校的造反派代表座谈。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分别在会上作了讲话。

这个会，实际上是当时高层召开的一次有北京几大学生领袖在场的“紧急会议”，是针对当时北京发生的“炮打康生事件”，由中央领导层出面“打招呼”，代表中央作一个“力保康生”的表态。

那天会上，陈伯达作了开场白后，首先由江青讲话。江青对在场的红卫兵“领袖”们表露出“战友”情谊，说：“同志们，我今天想讲几句话。今天到会的大都是同我们共过患难的战友，因此可以坦率地交心。”

接下来，江青指责了当前北京一些高校（包括清华井冈山在内）出现的“炮打康生”和大字报（也包括诽谤周恩来的大字报）。江青说：“我们是内部会议，对犯了错误的同志，我们欢迎他承认错误。”接下来，江青谈到报纸问题。江青说：“为了党中央的威信，我们在《人民日报》版面上费了不少心血。要集中力量把《人民日报》办好。”

接着，江青话锋一转，说：“《北京日报》、《工人日报》，你们费那么多心血干什么？让那些编辑老爷们先参加文化大革命，到工农中改造思想，去劳动。我们不要去抓那几个报了。”

江青这里针对的是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先后进驻《工人日报》、《北京日报》等首都各大报社，试图夺权共同办报，监督办报的事。

之后，江青谈起当前已呈发展势头的红卫兵造反派小报说：“你们自己的小报不是出得很好吗？清华《井冈山》报也不错，不过也有可能走上歧路。”¹

江青这番讲话，是中央高层领导最早也最直接肯定红卫兵小报的公开表态，而且指名称赞了蒯大富控制下的清华《井冈山》小报。当然，江青这番表态，可能和当时毛泽东对红卫兵小报持赞许肯定的态度有关。前文已叙，几天后毛泽东即指示《人民日报》全文转载《首都红卫兵》报上的文章。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这天的讲话，迅速被各地红卫兵、造反派传抄转载，北京及各地省市自治区主要的红卫兵及造反派小报，均作了刊载。蒯大富控制的清华井冈山，从上到下，更是大有受宠若惊之感。江青这个讲话一经宣传扩散，以及连同当时中央对红卫兵小报的一些非常举措（如《人民日报》连续转载小报的文章，《人民日

¹ 江青讲话，载《新北大》第31期，1967年1月28日。

报》、《红旗》杂志社，以及革命历史博物馆发公告公开征集造反小报等），对已出现发展势头的红卫兵造反派，更是一个强刺激，由此迎来了一个非常发展期。

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对红卫兵造反派办小报这种“创举”如此肯定，如此赞赏和器重，红卫兵小将也就更加愿意充当中央文革小组的马前卒，为中央文革冲锋陷阵，摇旗呐喊。对已经控制了中央文革小组成了“中央首长”的江青本人，则是大唱赞词，大表忠心，将其封为“文化革命的旗手”，在小报上作放肆甚至肉麻的吹捧。

以在全国影响甚大的清华《井冈山》为例，因为江青讲话中点名称赞了其《井冈山》小报，蒯大富等井冈山兵团头头又多次受到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照与支持，清华井冈山兵团上下对中央文革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井冈山》报第61期，以《井冈山报应该是中央文革的匕首》为题，刊载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自称为“零五部队一兵”的读者来信摘要，称：“中央文革对我们的小报非常关心，非常爱护，我们的小报应该是中央文革的拳头和匕首。”又说：“绝不要官气十足，脱离群众，脱离运动。报纸要活泼，要有生气，要尖锐泼辣。”¹

“拳头”，是作打人之用，“匕首”，更是刺人伤人之利器。蒯大富一手控制的《井冈山》小报，借这位自称为“零五部队一兵”之口，表达了要死心塌地追随中央文革小组，将文革进行到底，不惜充当其马前卒、急先锋的立场态度。

不仅如此。蒯大富控制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小报，在带头吹捧江青，为江青树碑立传，摇旗呐喊方面，也是态度十分积极，在众多的红卫兵小报中，表现也是异常抢眼“出色”的。

从1967年1月初，《井冈山》报以《清华园内春来早》为题的“编辑部文章”吹捧江青的“清华之行”开始，清华《井冈山》报直接吹捧颂扬江青的文章社论有10数次之多。其中比较露骨的就有：1967年5月18日出刊的《井冈山》第48期专门发表社论《学习江青同志的彻底革命精神》；一周后的《井冈山》第50期，以《向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致敬》为题，以1版转2版、再转第3版整整两个半版的巨大篇幅，刊载《井冈山》报编辑部与《电影批判》编辑部及中国戏曲研究院红旗兵团共同炮制的长文，系统露骨地吹捧江青十多年来所谓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开创性的“丰功伟绩”。不仅公开封江青为“文化革命的伟大旗

¹ 《井冈山报应该是中央文革的匕首》，载清华大学《井冈山》第61期，1967年6月27日。

手”，其中，甚至有这样一些令人肉麻的语句：“伟大领袖毛主席是这场世界文化革命的最高统帅，敬爱的江青同志是文艺革命战线上智勇双全的无产阶级英雄，是开拓京剧革命新道路的大无畏的披荆斩棘人！是冲锋陷阵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¹与此同时，还在该报第2版和第3版分别刊载了由中央美术学院创作供稿的颂扬毛泽东、江青的宣传画各一幅。

1968年春，“杨余傅事件”时，清华《井冈山》报第128期第一版发表社论《誓死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两个多月后，《井冈山》报再发社论：《就是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同时，在第一版社论之下，刊载长篇连载资料性文章《江青同志革命斗争事迹》，眉题是《伟大的旗手，英勇的战士》。²

蒯大富等红卫兵头头如此露骨而放肆吹捧讨好江青，除了他们实质上已在文革中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外（如江青1·22讲话中所说彼此是“共过患难的战友”），显然还不带有自己的政治目的和野心。

4、戚本禹、谢富治代表中央对“小报”问题表态

进入1967年1季度，随着夺权斗争的全面展开和深入，各地渐处掌权地位的造反派（包括一些下属团队）纷起办报，“文革小报”的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正在此时，由于形形色色的小报充斥于北京及外省城市街头，其所载内容也越来越出格，主办者的胆子也越来越大，许多内容直逼党和国家核心机密，外国驻华机构及相关人员，不惜代价收购小报及各类传单的行动也日渐加剧并造成影响。这些情况终于引起了中央高层的注意和警觉，不得不对红卫兵造反派小报正在形成的这种势头予以重视，并对此作出一次公开的表态。

代表中央出面讲话的是，其时已红极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以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其时，经毛泽东批准谢富治已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列席成员，可以出席已取代政治局常委会的“中央文革碰头会”）。而且，谢富治已被内定为即将成立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成了北京市的主要负责人。由于这次讲话对象，主要是北京红代会及下属各组织小报负责人，以及印刷厂负责人，由他出面比较适合。而这次针对小报问题的谈话，显然也是得

¹ 《井冈山》第50期，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1967年5月25日。

² 《井冈山》第147期，1968年6月14日。

到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央领导层的授权而特别安排的，非戚、谢两人的即兴而为。

这次谈话，于1967年3月4日晚在全国政协礼堂进行，参加者为“北京红代会”所属的各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及小报的负责人，以及北京市各印刷厂的军管会人员或造反派代表（因为各种小报要通过印刷厂印刷）。所用名义是关于小报的一次“座谈会”，实则是由戚本禹、谢富治代表中央对小报问题重要表态。

会上，主要由戚本禹讲话，谢富治只是作些补充性插话。

戚本禹就小报问题一共讲了6点。

首先，戚本禹开门见山地说：“最近北京出版的东西很多，有些出了许多问题。”之后，戚本禹以一种很严厉的口气告诉在座者说，外国特务用大量金钱购买有关这方面的材料（指小报、传单及文革资料、讲话等）。据说，这方面日本的情报机构作得最出色。有关人员还因而受到上司表扬和奖励。

第二点，戚本禹提到《百丑图》问题。戚本禹说：“什么《百丑图》、《群丑图》，他们（指所谓走资派和黑帮）本来是一小撮，却被画成浩浩荡荡的队伍，这是替谁作宣传？”又说：“有的甚至把‘坐喷气式飞机’（指揪斗干部时的姿势）也画出来了。毛主席不主张这些。这不能打倒敌人。”这里，戚本禹第一次向外界透露了毛泽东不赞成《群丑图》这类搞法，以及反对在批斗干部时搞“喷气式”体罚的信息。

第三点，戚本禹讲到充斥于小报和文革资料上的，各种版本的所谓“中央首长讲话”问题。戚本禹说：“关于我们的讲话，许多被歪曲了。”

这时，谢富治在一旁插话补充说：“有人说我讲过大联合行不通，没有这回事。又说我讲什么‘天津夺权有问题’。我根本就没去过天津。”

戚本禹接着这个话头继续说道：“最近外国报导了我一段讲话，什么‘刘邓路线统治了十七年’。其实，我说我们和刘邓路线斗争了十七年。凡是我亲笔写的东西才可相信。许多谣言不象话。我们靠真理吃饭。”然后，戚本禹话锋一转，环视一周，向在座的小报“主编”们发话道：“你们是学新华社还是学路透社？”（路透社当时被视为西方通讯社的代表，被其时的中国当局指认为对中国攻击造谣的西方反华舆论的“代名词”。）

第四点，戚本禹讲到当时大量传抄转载的未发表的毛泽东著作、讲话，和“毛主席诗词”问题。戚本禹说：“主席著作和主席诗词（未发表的），不能随便印。

有些（毛主席）诗根本就不是主席写的。”之后，戚本禹再次提到所谓“首长讲话”的事，他给这些小报的负责人出主意说：“关于首长讲话，你们可以按大意写成文章，就说上级有这个意见，这就不会出问题了。”

第五点，是关于小报印刷和纸张供应的具体问题。戚本禹当场代表中央文革小组作出指示：“各大专院校的小报，出版（印刷）和纸张供应，由红代会聂元梓、谭厚兰组织一个小组，审查后交谢富治副总理批准，再交有关部门执行。”

有意思的是，戚本禹这是当场向有着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身份，并且即将走马上任掌管整个北京市大权的谢富治发号施令，这说明当时戚本禹因毛泽东和江青的信任，可谓权势熏天，不可一世，地位明显在谢富治之上。

第六点，是关于小报的政治方向及编辑人员的政治立场，戚本禹说：“各小报，要选派政治灵敏度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真正左派担任主编。如宣传不好，要起坏作用。这是个严肃问题。”

戚本禹这个讲话流传出来，后来被冠以《中央对办小报的指示》的标题，被红卫兵造反派传抄或刊载于小报上。¹

平心而论，戚本禹这个讲话，除少数地方外，基本上还是贯彻传达的以周恩来为主的中央领导层对待小报及相关问题（如对待毛泽东未发表的著作和诗词，对中央领导的讲话等）的意见和指示，尤其是与周一贯主张和强调的关于“内外有别”的原则很一致。其基本出发点仍是当时的中央领导层，试图对红卫兵小报中越演越烈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和混乱状态，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失密等关键问题，作出一些力所能及的限制和干预，试图将造反小报逐渐引到一个比较健康的正常轨道上来。

5、中共中央对小报问题发出的正式文件

可惜由于整个文革局势的失控，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有意无意的纵容庇护，除北京红代会下属的几家主流红卫兵小报，在一段时间内稍微有些收敛改正外，全国各地整个小报的大局面，并未因戚本禹代表中央的这次表态而有所改观。反而

¹ 戚本禹、谢富治讲话，见《中央对小报的指示》，载上海《文革通讯报导》第14期，红卫兵上海市东风造反兵团文革通讯报导编辑组，1967年4月6日。

由于派性膨胀带来的派仗以至武斗加剧，各地乱办小报之风，以及小报内容严重出格的现象更加严重。

有鉴于小报出现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央高层不得不再次作出反应，这次是以中共中央正式文件的形式对各地小报问题作出一系列明确指示和规定，要各省市予以遵照执行和整改。

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改进革命群众的报刊的宣传意见》。该《意见》对各省市自治区群众组织所办小报，一共提出了7条整改意见。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先生在其著述中，透露了中央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文件称：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组织编印的各种报刊、传单，在宣传战线上起了重要作用。现在根据这类报刊宣传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如下改进意见：

一、群众组织的报刊，应严格遵守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并参照《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重要社论和评论进行宣传。

二、毛主席、林副主席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讲话、批示，都一律不得擅自刊登和印发。中央的内部文件、会议记录和负责同志的内部谈话，一律不要擅自刊登，也不要以小册子和其它形式编印流传。

三、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彪同志直接领导的非常战斗化、非常无产阶级化的军队。报刊上不得公开发表反对人民解放军的文章和报导。对于他们的支左工作有意见，可以向上级反映，也可以当面批评。有的报刊，在中央作出明确规定之后，还发表公开反对人民解放军的文章，这是完全错误的。

四、必须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目前，群众组织的报刊泄密相当严重，在一些文章、报导中，透露了国防工程、设施，部队调动情况，备战计划、措施，以及经济建设、外交斗争、机要事务等等重要机密。这种现象必须迅速制止。

五、宣传要突出政治。对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要着重从政治上、思想上揭深批透。不要搞“黄色新闻”以

及其它庸俗、低级的东西。

六、对国际问题的发言权集中于中央。对于国际上重大问题的宣传，要按中央方针政策进行。

七、在宣传报导中，不要传播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马路新闻”，尤其不要轻信和传播政治谣言。¹

应当说，中央这个文件，所涉及的范围已十分广泛，内容也比较具体，由此说明中央高层已经意识到各地小报存在的问题已十分严重，到了痛下决心，由党中央名义出面，非管不可的地步。

然而，文革局势的发展是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这份中央文件下发不久的1967年夏季，局势严重失控，不仅各地因派性斗争转化升级为公开武斗，且越演越烈，而且相继发生了武汉“7·20”事件及北京围困中南海等严重事件，中国几乎到了爆发内战的边缘。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领导层，主要精力都集中在这些严重局面及事件的处置，以及大局的稳定等紧迫问题上，文革小报及相关的问题，此时显然已经退居次要再次要的位置上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上述文件如同当时大多数文件及指示精神一样，并未很好得到落实和纠正。由此，各地方小报依旧情况如故。问题不仅仍然存在，而且也越发严重（比如武汉“7·20”事件之后的揪军内一小撮，大多数地方造反派的小报将攻击矛头指向当地驻军）。这正如穆欣先生在文章中指出的：

由于当时局面已经逐渐失控，随后就是7、8、9月的更大混乱，所以这一《意见》也同其它有关《通知》、《决定》一样，难以产生应有的抑制作用。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央对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的错误言行采取严厉措施之后，情况才变得好一些。²

不过，北京因为是首都，又鉴于从7月中旬到8月，发生了红卫兵造反派100万人围困中南海达数十天的严重局面。为控制首都秩序，遣返外省市驻京人员，

¹ 穆欣：《新闻界在“文革”初期受到的严重冲击》，见《中国共产党若干历史问题写真》下卷，中国言实出版社。

² 同上。

遂于1967年9月8日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及北京卫戍区出面发布公告，要求各地来京人员不得在北京各学校、机关及单位设立联络站，也不得在京编印出版小报，违者将予追究。当然，这一带有强制性的措施也产生了一些效果，但也是仅仅控制了外地在京人员的活动，及外地小报在首都的出刊，对北京本地小报作用不大。而各省市自治区的小报也大多数未按中央5月文件精神整改。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68年下半年因时局变化为止。

6、康生、陈伯达、姚文元关于小报的讲话

到了1967年下半年，已高居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在中央文革小组担任要职的康生和陈伯达，先后在接见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中，内容有涉及到文革小报的地方。两人讲话的背景不同，其主要立足点也大不相同。

1967年9月14日，红卫兵上海革命造反委员会（“红反会”）与各部、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革命造反联络站合编的《文革通讯》第90期，第1版头条位置以《康生同志建议不要张贴有关打砸抢的传单》为题，刊载了康生这次讲话的摘要。康生在讲话中说：“贴出去的要覆盖上。你们这样搞，不是搞好文化大革命，是破坏文化大革命，是帮修正主义的忙，帮帝国主义的忙，帮反动派的忙，这是出我们的丑。谁高兴？反动派高兴，赫鲁晓夫高兴，蒋介石高兴。你们贴出去，马上被人照去了，这些传单在香港一张要值一百元美金。这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北京是毛主席住的地方，你们这样做法是给共产党抹黑，给毛主席抹灰。”

1

康生这里讲的文字、材料、传单，其中就包括小报类材料，尤其他说：“这些传单在香港一张要值一百美金”，那实际主要是对小报而言。因为其时，无论从数量品种，还是内容质量而言，文革传单都是无法与文革小报相提并论的。实事求是地讲，康生尽管在文革中作恶多端，伙同江青等干了不少坏事，但这番关于传单小报的讲话，还是与中央历来的口径大致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从保守国家机密，不让外国反华势力利用这些小报、传单等作为攻击我国之材料这个角度来讲，还是从维护党和国家利益出发的，因为当时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央领导层，

¹ 《文革通讯》第90期，红卫兵上海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红反会）、各部、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革命造反联络站合编，1967年9月14日。

多次强调过，无论大字报、传单、还是小报等，应当做到“内外有别”的。

而陈伯达9月间涉及文革小报的一次讲话，却完全是另一番意思。

1967年9月4日，陈伯达以“中央首长”的身份接见《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新华社的领导班子及相关人员。陪同接见的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后来成为中国“舆论大总管”的姚文元。

上海师大以“上海红代会（筹）新师大联络组”名义出刊的《新师大通讯》第84期，根据内部记录稿，以《新闻界要以毛主席的革命轨道为轨道——9·4陈伯达、姚文元同志对解放军报、人民日报、新华社负责人讲话摘要》为题，详细披露这次讲话的内容。共分成5个部分，分别是：“（一）报纸工作的重要性和新闻工作的严肃性；（二）关于宣传工作的问題；（三）报纸的社会问题；（四）关于红卫兵报纸问题；（五）新闻单位的内部运动”。

接见时主要由陈伯达讲话，其基本点是当前（指文革高潮期）代表中央声音的“两报”（《人民日报》及《解放军报》），办报必须掌握的方向和应当注意的问题。陈伯达长期以党内“笔杆子”自居，文革刚开始即奉中央指令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夺了《人民日报》的权，眼下又居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高位，因之在讲话中他不免居高临下，以“教师爷”的口气对在座者指手划脚，教训一番。

陈伯达说：“要把报纸办好，要把社论写得好好的，要把毛泽东思想举得高高的，报纸是中央的声音，所以一定要传达毛主席的声音。北京的报纸宣传影响到全国各地。”又说：“国庆节快到了，中央要发社论，要大讲成绩，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斗批改。文章不超过一万字。文章要有新语言，别出心裁，不要浸透旧的语言。”

从陈伯达讲话的下文看，他这里所说的“新语言”，“别出心裁”，其实就是文革时期，红卫兵、造反派所谓“充满火药味”的语言；“别出心裁”则是要党报的编辑记者们打破原来的框框和束缚，象小报那样搞些新花样。

讲话中，陈伯达还说：“上头是毛泽东思想，下头是群众的思想。这样写起来就尖锐、鲜明、生动。”又说：“国庆节要多搞大联合，新气象。报纸要起引导群众的作用。我们的社论要别出心裁，要有新的词句，新的内容。你们有的社论写得很平淡。”还说：“题目很重要，题目是灵魂。”

这时，姚文元插话说：“毛主席对题目很重视。”

该讲话的第四部分《关于红卫兵报问题》，姚文元讲得比陈伯达更多，更具体，但陈伯达的讲话却带有号召性、指令性。该部分全文如下：

姚：毛主席非常重视红卫兵报，有很多文章是毛主席亲自推荐的，我们在这方面也要紧跟毛主席。红卫兵报上好文章要选登，要发现好文章。凡是能把运动推向前进的好文章都要选登。红卫兵文章加以推荐，这是走群众路线。走群众路线是我们基本的办报思想，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陈：要很好地向红卫兵报学习，不要以大报自居，要当小报的小学生。

1

这个讲话表明，陈伯达、姚文元是要代表“中央的声音”的《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及新华社，从领导班子到编辑记者们，向红卫兵造反派的小报学习看齐，从社论的题目，到新闻报导和文章的语言文风，都应该学。“新语言”、“新的词句”、“新的内容”、“别出心裁”，这些都是中央大报向红卫兵造反派小报学习的地方。而且告诫“要当小报的小学生”。陈伯达这里表现的对小报的欣赏、肯定、溢美之情，毫不掩饰。

以陈伯达、姚文元当时的身份和高位，对红卫兵小报的这番吹捧评价，当然让那些编辑出刊的红卫兵造反派头头欣喜不已，也大长其信心。

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对小报的这种赞赏肯定和表态，也是致使各类文革小报直到1968年上半年，高潮不退的原因之一。甚至在1968年上半年，各地还不断有新创刊的小报问世。

¹ 《新师大通讯》第84期，上海红代会（筹）新师大联络组，1967年9月15日。

【博士论文】

政治身份体系下的社会冲突 ——文革初期群众行为的社会根源（四）

向前

第二章 夺权后的分裂和混乱（1967.1—1967.8）

第一节 夺权浪潮和“三支两军”

1 全面夺权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总结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成果,提出了1967年运动的目标:

“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¹

社论号召人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结合《十六条》所说的“要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来看,全面夺权是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篇号召“展开总攻击”的元旦社论,无疑是发布全面夺权的动员令。²

1月初,上海造反派率先宣布“夺权”。1月6日,以“工总司”为首的造反派组织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将原上海市委领导班子彻底改组,这次大会是上海“一月革命”的开端和标志。1月8日,“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成立,成为全市生产的实际领导机构。随后又成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

¹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人民日报》,1967年1月1日

²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118.

员会”取代公安司法机构。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¹后由于毛泽东不赞成用公社之名，²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³

毛泽东表示支持上海的夺权行动，他对中央文革小组谈话说：“上海市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以及全国各省市。”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出了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贺电说：“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⁵对上海“一月革命”的赞誉在1967年1月不断升温，《人民日报》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吹响了全国夺权的冲锋号。⁶

上海“一月风暴”在全国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影响，其他地区立即效仿。各地造反派响应号召闻风而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活动转入夺权阶段。山西（1月14日）、山东（2月3日）、黑龙江（1月31日）、贵州（1月25日）等省纷纷夺权，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全面夺权的新阶段。湖南长沙的造反派要夺权，要批判省委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保守派组织则针锋相对保卫省委市委。正当“湘江风雷”、“高司”等和“长保军”斗得难分难舍的时候，中央支持了造反派。1月16日，《红旗》文章指出：

¹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121-122．

² 1967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审批贵州省成立“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的材料时，批示：“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请你们在四份材料一律改过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238。1967年第5期《红旗》杂志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一文中，毛泽东写道：“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后来，各地均采用了“革命委员会”的名称。

³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中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中的指示，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就上海临时最高权力机构的名称问题进行了讨论。我们深深感到，这一指示充分体现了中央对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关怀，对上海人民的革命精神的最大爱护。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正确指示，一致通过把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见《文革文库》。

⁴ 《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事件的谈话》，1967年1月8日。见《文革文库》。

⁵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1967年1月11日。见《文革文库》。

⁶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人民日报》，1967年1月22日

“这一小撮人利用他们手里掌握着的那些部门、那些地方的部分政权，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镇压革命群众。谁要起来革他的命，就要把谁打成‘反革命分子’，以至开除、监禁。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歪曲地利用‘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欺骗一些群众，组织什么‘红色政权保卫军’等等御用团体，来保他们自己。”¹

这些话语全部都可以对号入座——省委市委掌握着国家权力，派出工作队期间和抓“黑鬼”将大批学生和群众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8·19事件”中镇压学生，压制群众运动。中央指示成为造反派组织的强大后盾，更令他们高兴的是对手“长保军”被定性为走资派的“御用团体”。

1月22日，周恩来在外地来京群众有线广播大会上的讲话宣布了“长保军”的垮台。他说：“‘中国工农红旗军捍卫军’、‘全国工农兵夺权司令部’、‘北京革命造反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湖南红色政权保卫军’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都是反革命组织，对这些组织的首恶分子坚决施行法律制裁，其中受蒙蔽的群众赶快觉悟起来揭发首恶分子”。²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对“长保军”等保守派群众组织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长保军”以解散告终。

造反派组织的“砸烂”、夺权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1967年1月3日，省公安厅办公大楼被群众组织封闭。4日，长沙市公安局办公大楼被群众组织封闭，“湖南省文艺界红色造反团”进占省公安厅和市公安局。³由于军队按中共中央规定代为保管省委重要档案资料，而造反派怀疑其中有整群众的材料。军队有些单位确实提供秘密处所让地方“走资派”藏匿，⁴11日开始，群众开始冲击省军区，强行封闭保密库房和办公楼。⁵17日，“湖南红旗军”以搜查黑材料名义封闭军区办公楼一、二、三楼，19日封闭了四楼。冲击省军区的行动使军区作战指挥系统中断21小时。⁶24日，“长沙市红色造反联合会”强行进驻市委、市人委机关，夺党、政、财权。

¹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红旗》，1967年1月16日。见《文革文库》。

² 《周恩来陈伯达在外地来京群众有线广播大会上的讲话》，1967年1月22日。见《文革文库》。

³ 长沙市志编纂委员会。长沙市志(第2卷)[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439。

⁴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141。

⁵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大事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787-788。

⁶ 长沙市志编纂委员会。长沙市志(第2卷)[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439。

造反派组织夺权活动风起云涌，迅速席卷了各事业单位和农村。¹各地党政领导机关瘫痪。除军队系统外，党、团组织均陆续停止了组织活动。²《湖南日报》社内部群众组织宣布夺取报社领导权，声明该报从此脱离湖南省委领导，也不再是省委的机关报。报社内部夺权又招来外部夺权或反夺权，该报成为各派群众组织争夺之后进行论战的工具。夺权期间，张平化等领导人被群众组织控制起来，失去行动自由。³以复员、退役、转业军人为主体的“红旗军”曾经数次冲击省军区，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红旗军”的行为受到了中央的严厉批评，马上就招致了祸患。1月20日，中央发出《关于湖南红旗军、红导弹等红卫兵组织到湖南省军区动手打人、抓人问题的指示》，将红旗军定性为反动组织，要求抓捕其“少数头头”。“红旗军”、“红导弹”等组织核心负责人被抓捕。⁴抓捕引起了“湘江风雷”等的强烈反应，这些造反派组织与省军区的矛盾也由此发端。

2 “反革命经济主义”

伴随“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夺权，席卷各大中城市的是“反革命经济主义”，也被称为“经济主义妖风”。⁵由于各级、各单位领导不是被打倒就是靠边站，群众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表达不满，多年积累的怨气全都爆发出来。

“反革命经济主义”最为严重的是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大工业城市，上海工厂多工人多，问题自然也多，闹“经济主义”的工人包括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学徒工也包括在职正式工人。其次，上海的“上山下乡”知青、“支疆”青年、“回乡支农”工人、支内职工数量非常多。其他地区“经济主义”的类型相差不大，只是程度不同。

在湖南，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各单位领导对于签字批发群众组织活动经费和物资大为慷慨——如果不同意的话，很可能背上“压制群众”的罪名。此例一开，其他各种要求随之而来。正式工人要求解决福利、待遇问题，

¹ 长沙市志编纂委员会. 长沙市志(第2卷)[M]. 长沙: 湖南出版社, 1995: 440.

²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省志·大事记[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 789.

³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省志·大事记[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 788.

⁴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湖南红旗军、红导弹等红卫兵组织到湖南省军区动手打人、抓人问题的指示》，1967年1月20日。该指示说：“军队负有战备任务和保卫文化大革命任务。不能允许外人冲入指挥、保密等系统，不许接管。红旗军是反动组织，必要时将其少数头头逮捕，可起分化瓦解作用。军区负责人，应挺身而出，对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工作。”见《文革文库》。

⁵ 本文使用“反革命经济主义”、“经济主义妖风”只是套用当时的称呼，并无贬义。

临时工、合同工要求转正成为正式工，被动员下乡的人们控诉自己所受的“迫害”，要求回城工作。衡阳党政机关和其他单位以前被下放农村的人马上回城，成立了各种战斗队批判他们认为需要对自己下放负责的干部。他们除了查抄“黑材料”之外，还专门批斗那些把他们下放到农村的领导干部，提出的要求包括补发“受迫害”以后的工资，回原单位工作等等。¹

临时工、合同工建立了自己的组织。趁着大串联的机会，与其他地区的临时工、合同工一起为自己的利益奔走呼号，11月8日，“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者总团”（简称“全红总”）的全国总部在北京冶金部第二招待所成立。²成立当天，组织负责人罗运泉、廖阁夫等带领首批成员50多人到全国总工会会议厅静坐，要求总工会承认“全红总”并给予注册登记。静坐持续到11月18日，人数由最初的50多人增加到3007余人。当天，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王志杰代表全国总工会口头上承认了“全红总”是合法的造反组织。之后，“全红总”的湖南分团、黑龙江分团、吉林分团、广西分团、广东分团、江苏分团、上海分团、河北分团、内蒙古分团、安徽分团、江西分团相继在各地成立。

12月1日，“全红总”300多人占领全国总工会礼堂，³12月25日查封劳动部办公场所，第二天又查封了劳动部所属单位。查封之后，“全红总”马上向全国各地分团发出电报，号召将劳动调配部门全部查封。这时的江青、陈伯达等人似乎只看到临时工、合同工的活动有利于促使“造反”形势高涨，却没有更深一层考虑到“经济主义”背后的问题。26日，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会见“全红总”代表，支持他们“非造这个反不可”，还抨击合同工制度“就像资本主义对待工人一样”，“这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一套，保留一定数量的雇佣工来减少资本的支付”。⁴接见中，“江青、陈伯达同志听到了工人的控诉，都流下了痛苦、愤

¹ 应山红．雁阵惊寒：湖南衡阳文化大革命史事．（未刊稿）：76，79，81．

² 1966年11月到1967年2月间，“全红总”的领导核心“五人小组”，共有三届，负责人如下括号内为省籍。第一届：王振海(北京)、方圆(贵州贵阳)、罗运泉(湖南长沙)、廖阁夫(湖南长沙)、郝维奇(北京)。第二届：王振海(北京)、方圆(贵州贵阳)、李晋瑄(北京)、金展云(北京)、郝维奇(北京)。第三届：方圆(贵州贵阳)、杨政(湖南长沙)、李晋瑄(北京)、金展云(北京)、郝维奇(北京)。参加“全红总”总部活动的湖南省人员先后有长沙的工人罗运泉、廖阁夫、杨政、龙云学和余云庆等。“全红总”湖南分团在省内的活动情况缺乏资料，不知详情。

³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154．

⁴ 《江青陈伯达与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代表的谈话》，1966年12月26日。见《文革文库》。

恨的热泪。”¹可见，“经济主义”刚刚冒头的时候，江青、陈伯达等人没有意识到可能引发的后续效应，为加大造反声势，他们对“全红总”表示了支持。

江青接见“全红总”的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可是事与愿违，到来的“新高潮”却偏离了运动的大方向，一场波及全国、声势浩大的争取转正、同工同酬、改善福利待遇、补发拖欠工资的“经济主义”浪潮铺天盖地而来。工人们提出的要求大致有如下几种。²

一是要求平反，包括纠正抓“黑鬼”和以前运动的遗留问题。如付洪澡要求省物资公司给予平反和恢复工作，王民贵、何辉煌、谭兴华、曹淑美等要求平反复职。二是下放职工要求复职，并补发下放费、退职费等。如张之武要求长沙汽车电器厂让自己复职工作，雷松华等21人要求复职，朱志南要求给爱人恢复工作，沅陵县木帆运输社吴同用要求补发下放费，袁寿林要求恢复做技工使用，余以娟、高兴元要求补发下放费，雷运光要求补发退职费，夏妙娥要求补发开除她工作期间的工资。三是认为过去评定的工资级别不合理，应补发差额和奖金、补贴等。许多人提出单位领导当初没有按照有关文件办理，压低了工资标准，要求按当时文件重评工资级别，并补发差额。部分正式职工也参与其中，如霍然易等反映他们是复员军人，工资待遇不合理，兰诗文反映福利待遇问题，郴州市运输公司全体职工要求镇委退赔1960年和1961年平调该公司的奖金。四是非正式职工要求享有职业保障，工厂不得辞退临时工、合同工及外包工，取消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就业制度；要求在政治上、经济上与国营企业职工享受同等待遇，提高工资与劳保福利，例如能够加入工会，建立自己的群众组织，将计件工资、日工资改为月工资，享受医疗保险和病假工资等等。五是学徒工反映工厂延长了他们的学徒期。如湖南橡胶厂全体青年工人强烈反对工厂领导延长学徒期，蒋寿华等反映白沙市人民印刷厂延长学徒期。六是反映与单位领导的摩擦和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如周长兰反映矿山领导打击报复他全家等等。七是要求发放各种文革活动经费，如串连费、宣传费、袖章费，或要求脱产参与运动期间工资照发，或要求单位提供运动所需的设备工具，如扩音器、喇叭、汽车、自行车等。

¹ 《江青陈伯达与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代表的谈话》，1966年12月26日。见《文革文库》。

² 湘档省委工交政治部档案(1964年——1967年)，144-1-1043，4-51；省委工交政治部档案144-1-1050，4-36；省委工交政治部档案144-1-1165，1-12，64-70。

闹“经济主义”的另一重要群体是文革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¹湖南从1963年开始大量动员城镇初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至文化大革命前夕，全省知识青年人数达到8.3万余人。²开始，知青组织的口号和行动多为控诉“资反路线”对知青的迫害、歧视。江永县白水知青成立了“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后来改名为“湘江风雷反到底战团”，就地造了江永县委的反。很快，知青就不再满足在农村“闹革命”，他们深知知青问题不是在农村能够解决的，问题出在下面，根子却在上面。湖南约6万多知青借串联之机返城。³他们“回城闹革命”的活动之一是“造户口反”，即要求相关部门的领导干部解决城市户口、粮食、工作和“革命经费”问题。“造户口反”的知青提出“文化大革命”不应该只是口号革命、罢官革命，而应该是一场社会革命，应该解决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首先应该改变知青被安置的命运。知识青年不是失业者，应该有人权，有参加革命和工作的自由权利，应该到社会上去闹革命。⁴有的知青趁乱威逼相关单位工作人员办理户口迁移，拿到盖着公安局鲜红印章的那张纸时，欢喜若狂，流泪满面。⁵除了千方百计迁户口之外，知青们还热衷于批斗农垦局的“走资派”和街道办干部。批斗农垦局领导干部，是因为主管知青工作的“安置办”设在农垦部门；批斗街道办的干部，是因为就是这些人动员甚至强迫他们上山下乡的。知青和他们的父母举行了全市性的集会示威，并召开了对上山下乡办公室干部的批判会。⁶

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展以后，知青造反组织“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造反团”等初见雏形。湖南知青在长沙成立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造反团湖南总部”，是省内影响较大的知青组织。省内其他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组织，如邵阳的“小兵司令部”。⁷另一知青组织“湖南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联

¹ 此处“知识青年”指的是文革以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与1968年以后的知识青年称谓相同，却不是同一群体。

²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省志·共产党志[M]. 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221.

³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省志·共产党志[M]. 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221.

⁴ 韩刚. 遥远的太阳破[A]. 见：黄尧，蒋巍. 辉煌的青春梦——知青生活纪实[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139-140.

⁵ 老柯. 魂殇[A]. 见：邓鹏. 无声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51.

⁶ [美]托马斯·伯恩斯坦. 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M]. 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327.

⁷ 朱鹏涛. 峥嵘岁月中的“小兵”——忆文革初期邵阳市下乡知青红卫兵“小兵司令部”[A]. 见：政协邵阳市学习文史委. 抹不去的记忆——邵阳知青回忆录之一[M]. 邵阳：（内部出版），1999：379.

合调查团”调查各地知青生存状态，除了临湘的黄盖湖农场、平江的时丰茶场等知青集中地外，还去了湖北的洪湖与赤壁，与当地的武汉知青进行了交流。下放知青的串联极具亲和力，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生活经历和家庭背景，尤其是受到迫害和侮辱的知青，更是把串联知青当成亲人和救星。¹1966年底，湘江风雷成为省内最大造反组织。知青组织全部站在湘江风雷一边，部分知青加入湘江风雷，组成了以知青为主，隶属湘江风雷的“山鹰战团”。

文革初期对大多数干部的批斗，既源于上层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源于群众发泄自己的不满。毛泽东批判“走资派”的号召使群众有机会对干部进行清算。因此，上层的导向与底层群众的愿望相互交错而又相互影响的。²应当看到，多个群体不约而同地闹“经济主义”已经发展出一定的主体意识，也正因其自主意识的出现而与毛泽东的目标出现背离而“干扰了运动的大方向”。中央高层察觉了“经济主义”将会带来的连锁反应，毛泽东当机立断，将之斥为“反革命经济主义”和“经济主义妖风”，把原因归为“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转移斗争目标，挑动不明真相的少数人大闹经济主义”，至于解决方法，通知说：“在中央没有提出新的办法以前，暂不变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参加农业生产。”³周恩来总理说：“（党内一小撮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收买人心破坏文化大革命，对中央施加压力，煽动文教工作者、小学教师、合同工、临时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机关干部大批来北京”，“我们要打回老家去，彻底闹革命。”⁴

2月，中央发出通告：“所谓全国性组织，中央一律不予承认，所有这些组织应当立即取消。他们的成员应该立即从北京等地回去，到原单位参加运动。”⁵一批全国性组织被取缔，其中包括临时工、合同工、知青为主体的群众组织，如“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全国国营农场红色造反兵团”、“全国上山下乡红色革命造反团”、“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第一线战斗队”等。⁶另外，中央

¹ 庄生蝶. 文革中的长沙上山下乡知青运动——记我在文革期间的一段经历. (未刊稿)

² 李逊. 文革中发生在上海的“经济主义风”[J]. 华夏文摘增刊, 1998, 158: 1.

³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1967年1月11日。见《文革文库》。

⁴ 《周恩来陈伯达在外地来京群众有线广播大会上的讲话》，1967年1月22日。见《文革文库》。

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国性组织的通告》，1967年2月12日。见《文革文库》。

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的通告》，1967年2月17日。见《文革文库》。

还命令所有迁入内地的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调入或借调支援内地建设的职工，支援边疆建设的职工，“凡是目前已经回到原调出地区的职工，应该迅速返回内地和边疆。”¹

“经济主义”风潮只存在了很短的时候就被强行压制下去了。1967年的春季，知青返城造反风得到了有力遏制。然而，造反的人们却并未就此死心，他们暂时蛰伏起来，很快将在新的场景登台。

3 “三支两军”

支左以前，文革只在军队院校中开展。《十六条》说：“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²军委和总政对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特殊要求包括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指挥学校的学员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与连队相同的规定，只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内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和地方学校串连等。1966年10月5日的《紧急指示》提出这些规定“已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³虽然如此，《紧急指示》还是明确指出“军队院校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⁴力求把军队中的文革和社会上的文革分隔开来。

“夺权”气氛高涨的时候，毛泽东指示“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批示说：“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⁵由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文要求军队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⁶军队正式介入地方文革对运动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从1967年1

¹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援内地和边疆建设的职工应就地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告》，1967年2月17日。见《文革文库》。

²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见《文革文库》。

³ 《中共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1966年10月5日。见《文革文库》。

⁴ 《中共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1966年10月5日。见《文革文库》。

⁵ 《对解放军支左的重要指示》，1967年1月21日。见《文革文库》。

⁶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

月的形势看，人民解放军的支左，对于把夺权斗争推向全国，对于几个省市夺权的成功，都是起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¹

中央文件只说“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²却没有说哪些组织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也没有规定衡量“革命左派”的标准。一个合乎逻辑的现象发生了：除极个别大军区外，多数大军区经过短时间的考察、犹豫，都支持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多的、“出身好”的多的、劳动模范多的、比较守纪律的、拥护军队的一派。³有学者这样写道：“广大解放军指战员同人民群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长期所受的人民军队光荣传统教育与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理论又大相径庭。一般来说，军队中绝大多数干部、战士从思想上、感情上对造反派都持一种反感、冷落、疏远的态度。文化大革命初期，部队几乎都对党团员多、老工人多、劳动模范多的保守派持同情态度……全面夺权以后，他们又往往比较同情那些由保守派转化而来的比较温和的造反派。”⁴

1月20日，大学生造反派组织“高司”召开批判省委领导大会，省军区明确表态支持“高司”，认定他们是“左派”。因为“高司”成员都是大学生，历史清白思想单纯，而“湘江风雷”等组织人员构成复杂，其属下组织还冲击过省军区。中央明确说过“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⁵，冲击省军区无疑是错误的。正如后来广州军区上报中央的报告所写，军区部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时，“许多同志带着对某些革命造反派极不好的印象，以感情代替政策，以对待省革联夺权和冲击军区等‘四大事件’的态度去鉴别左中右，……对于某些偏于保守的组织，则认为听话，党团员多，出身成分好，没有参与‘四大事件’，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⁶

决定》，1967年1月23日。见《文革文库》。

¹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126

²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1967年1月23日。见《文革文库》。

³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200．

⁴ 郑谦，张化．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第三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95．

⁵ 《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1967年1月14日。见《文革文库》。

⁶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批发《广东省军管会关于前段支左工作的教训和下一步的做法》和《湖南省军区关于贯彻广州军区首长指示的情况报告》，1967年5月14日。见《文革文库》。

第二节 围绕领导权的争斗

1 “高司”与“湘江风雷”的决裂

“高司”和“湘江风雷”本是并肩作战的战友。组建“高司”的造反派大学生是“8·19事件”的主角。“湘江风雷”的多数负责人就是因为同情和支持这些造反派大学生，才被打成“黑鬼”。抓“黑鬼”的时候，大学生因为《十六条》的保护幸免于难。他们以战斗队、宣传队的名义到各地、市、各大厂矿，进行了深入调查，整理了“抓黑鬼”的大批材料“控诉资反路线的罪恶”，通过各种渠道把收集来的材料递交中央。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高司”的努力收获了回报，被打成“黑鬼”的人们得到平反，与“高司”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上造反之路。

随着保守派“长保军”的垮台，在如何对待省委市委领导、与当权派斗争的方式、如何为挨整的人平反和销毁、封存“黑材料”的具体操作等问题上，“高司”和“湘江风雷”出现了分歧。大学生们认为张平化前段时间尤其是“9·24报告”犯了错误，但是能够做检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应该给出路，平反的工作要依靠省委。“湘江风雷”等组织成员大多是“9·24报告”的直接受害者，他们要求彻底打倒张平化，而不是让他检讨过关了事。围绕领导权问题，双方也针锋相对。“高司”的大学生是造反先锋，争取为“黑鬼”翻案也赢得了广泛支持，在与“红保军”等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高司”方面认为自己是理所当然的领导者。“湘江风雷”号称拥有百万成员，实力强大，其主要负责人多为工人和普通工厂干部，不少人曾得到过“高司”的帮助。他们承认“高司”的功劳，但涉及到领导权问题就不肯示弱了。“湘江风雷”方面认为自己造反精神强，又是无产阶级的队伍，应该掌握领导权。

1967年1月，“望江楼协议”和“1·20”大会使“高司”与“湘江风雷”决裂。1966年12月底，张平化、王延春等与“高司”在湖南大学望江楼就平反进行商谈，省委同意拨款10万元作为召开全省平反大会的费用。¹会议在湖南大学望江楼举行，会谈成果被称为“望江楼协议”。“高司”与张平化的和解遭到其他造反派组织的反对，他们认为“高司”与张平化的和解是变右、变修的体现。

¹ 长沙市志编纂委员会. 长沙市志(第2卷)[M]. 长沙: 湖南出版社, 1995: 438.

12月31日,“湘江风雷”等组织发表声明,坚决反对“望江楼协议”。1967年1月20日,“高司”在湖南大学礼堂召开大会,批判湖南省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王延春、万达、章伯森等上台接受批判。¹省军区表态支持“高司”。从此,造反派组织分裂成为两大阵营,竞相召开批斗大会,争夺批斗对象,冲突日趋激烈。

能够影响运动形势的群众组织除了“高司”和“湘江风雷”外,还有“井冈山红卫兵”、“东方红总部”等。两派公开对立后,“井冈山红卫兵”、“东方红总部”和“青年近卫军”等支持湘江风雷。在湖南影响甚大的“首都三司”、“北航红旗”驻长沙联络站,及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也和“井冈山红卫兵”一起支持“湘江风雷”。²少数“高司”成员退出原组织,成立“高校风雷”、“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矿冶井冈山兵团”、“矿冶井冈山公社”等新的组织,反对“高司”。³中学生组织“造反有理军”与“井冈山红卫兵”分道扬镳,成为“高司”的盟友。湘潭工人造反派组织“革造联”在兰云飞的率领下成为“高司”的支持者。

省军区大力支持“高司”,还执行中央命令抓捕了“湘江风雷”下属的“红旗军”成员。“湘江风雷”对此反应强烈,1月21日,“湘江风雷”和“红旗军”等组织了东风广场的集会,⁴2万余人上街游行,反对中央文革和省军区的决定。⁵除了游行抗议以外,“湘江风雷”还把为“红旗军”翻案的标语刷满大街。2月1日,“湘江风雷”与“高司”在中南矿冶学院发生武斗,省军区派出解放军制止,才控制住局面。⁶

2 镇压“湘江风雷”

省军区上报中央文革小组的材料说:“长沙市有个叫‘湘江风雷’的群众组织,在长沙大搞打、砸、抢,火烧楼房,破坏公物,扰乱社会治安,是一个暴行累累的保守组织”。⁷2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发出指示,要求“湖南军区对‘湘

¹ 长沙市志编纂委员会. 长沙市志(第2卷)[M]. 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440.

² 杨大庆. 文革中的长沙“红中会”. (未刊稿)

³ 叶长青,陈益南. 文革中湖南的群众组织之概况. (未刊稿)

⁴ 长沙市志编纂委员会. 长沙市志(第2卷)[M]. 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440.

⁵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省志·大事记[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788-789.

⁶ 长沙市志编纂委员会. 长沙市志(第2卷)[M]. 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440.

⁷ 王广宇. 我所知道的陈伯达[A]. 见:阎长贵,王广宇. 问史求信集[M]. 北京:红旗出版

江风雷’和‘红旗军’的头目，应当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受蒙蔽的群众。”¹因为是2月4日发出，故称为“二·四指示”。²省军区午夜展开抓捕行动，支队长以上全部要抓。一夜之间，“湘江风雷”绝大多数核心成员被捕。

第二天，抓捕行动继续进行。“高司”成员配合驻军抓了100多名“湘江风雷”支队长以上成员，还抓了“首都三司”、“北航红旗”驻长联络站人员。³除了公开的“湘江风雷”总部及几大分部、战团的地点外，军人和“高司”的大学生并不清楚各单位的“湘江风雷”组织情况。但各单位内却有原“长保军”或“工人赤卫队”组织成员，他们主动为士兵充当耳目，甚至引领士兵到单位抓人。与“湘江风雷”关系密切的其他组织也有成员被抓，因为他们被说成是“湘江风雷的外围”。由于抓捕人数太多，长沙市各类监狱再容纳不下，只好将两座电影院征用，临时改作监牢。⁴18岁的中学生杨曦光因为加入隶属“湘江风雷”的“夺军权战斗队”，参与了反对省军区的活动，也被关进了长沙市看守所。⁵据估计，这两三天内的抓捕行动中，全省大约捕人在1万人左右。⁶

在其他地方，“湘江风雷”支队长以上负责人也悉数被抓，组织基本被摧垮。2月4日和5日两天，衡阳市“湘江风雷”1000余人被捕。衡阳“湘江兵团”（支持“高司”的群众组织）召开大会声讨“湘江风雷”、“红旗军”，还与驻军一起集会游行，揪斗衡阳“湘江风雷”负责人李瑞林等。湘潭市湘乡县，县武装部于

社，2009：354。另据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后来的检讨透露，上报中央关于“湘江风雷”的情况有夸大和不实——“如矿院上报打坏一百多万元的东西，实际上不到二万元。当时说到矿院造反派有八万多人，我们上报一万多人，实际上只有三千多人，当时说打死三个人，实际上并没有一个人；说湘江风雷有枪，实际上是展览馆的病枪。”《龙书金的检讨》，1967年7月31日。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

¹ 《全军文革办传达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湖南“湘江风雷”、“红旗军”的批示》，1967年2月4日。该指示之前，1月28日中央军委发出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过火行为做了限制，规定不许冲击军队，使一批军队干部感觉有了对抗造反派的尚方宝剑。针对“湘江风雷”的“二·四指示”可以视为《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延伸。

² “二·四指示”是谁作出的决定一直是湖南造反派在文革中刨根问底想弄清楚的问题，杨曦光等人一度认为周恩来是“二·四指示”的“黑后台”，因而“炮轰”。据王广宇的说法，“二·四指示”是根据陈伯达的批示作出的——湖南省军区上报的关于“湘江风雷”的材料被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编成了《要事汇报》，陈伯达在这份汇报上批示“责成湖南省军区把湘江风雷的头头抓起来，并把湘江风雷定成反动组织。”王广宇．我所知道的陈伯达[A]．见：阎长贵，王广宇．问史求信集[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354。

³ 《湖南“高司”代表给中央文革的书面检讨》，1967年8月8日。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

⁴ 陈益南．青春无痕[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104。

⁵ 杨小凯．自述[A]．见：肖瑞，李利明．理性与激情[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389。

⁶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大事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789。

2月5日晚抓捕“湘江风雷”支队长以上骨干56人。与“湘江风雷”观点相近的“湘中风雷”、“毛泽东思想红卫军”、“东方红联委会”、“驱虎豹”、“环球赤”、“红导弹”等组织被强令解散。

“高司”发起宣传攻势，把拥护省军区、拥护《二·四指示》、打倒“湘江风雷”的标语刷上大街。2月7日，“高司”发起召开批判、斗争“湘江风雷”、“红旗军”、“红色政权保卫军”反动头目大会。他们喊出“肃清湘江风雷的流毒”的口号把打击目标扩大到同情湘江风雷的其他造反组织。“高司”人员给“湘江风雷”的头头们挂上大牌子批斗游街，还把“湘江风雷”称为“湘江疯狗”，把支持“湘江风雷”的群众叫做“保狗派”。“肃流毒”的过程中，高司还不同程度地打击了“井冈山红卫兵”、“青年近卫军”等组织。

千余名学生组成战斗队到长沙的主要厂矿企业单位和机关开展宣传和调查。这一次的行動与“9·24”后下基层截然相反——以前帮助的对象这时候成了打击的目标，以前的对手现在成了盟军。各单位的原“长保军”、“工人赤卫队”人员成立新的组织出来活动。“高司”联合了这些以前的死对头，打击“湘江风雷”及其支持者。在曙光电子管厂，他们支持“工总”伤害了“联总”；在汽车电器厂，他们支持“汽电真理军”打击了“造反有理总队”；在长沙通用机械厂他们支持“怒火铁骑”排斥“3·31造反团”；在红旗内燃机配件厂，他们支持“无联”，打击“红总”等。“高司”负责人后来也承认这些行为“客观上扶植了保守派来镇压革命造反派”。¹“高司”的胜利背后潜伏着危机，“肃清流毒”的行为无异于为渊驱鱼，除了原保守派组织的成员外，“高司”没有群众基础。

同一时期，高层发生了“二月抗争”，老师们抨击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打击老干部和干部子女、不要党委领导、夺权、冲击军区等。地方上，不少军区出手压制造反派。3月，武汉军区发布公告，宣布“工总”为反革命组织，从总部到分部全都解散，并逮捕了数百人。广州军区镇压了曾经冲击军区的造反派组织，前后逮捕上千人。青海省军区宣布“八一八红卫兵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是“反革命组织”，流血事件造成169人死亡，178人受伤。“八一八”遭到严厉镇压，被逮捕、拘留、看管和软禁的人数达到10157人。²

¹ 《湖南“高司”代表给中央文革的书面检讨》，1967年8月8日。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

² 中共青海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青海省大事记[M]．西宁：（内部出版），1986：182-183

3 流产的“三结合”

夺权开始以后，两报一刊强调“革命的大联合”。具体的结合方案是“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大联合为基础的革命造反委员会。”¹“湘江风雷”被镇压后，省军区着手准备“革命的大联合”，²希望按照“三结合”原则建立新的领导机构。

在省军区的主持下，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召开，宣布由军区会同地方成立“省生产领导小组”，负责全省工农业生产事宜。³华国锋、万达被结合成为领导小组成员。⁴群众组织方面，“高司”和“长沙地区公检法夺权委员会”（简称“公检法”）等12个组织于2月8日发起成立了“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筹备委员会”。在此基础上，“高司”等宣布成立“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会”（简称“省红联”）。3月12日，“省红联”举行15万人大会，批斗张平化（缺席）、王延春、章伯森等人。14日，《湖南日报》宣布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17日，中共长沙市委机关群众组织宣布完成“大联合”。24日，省广播事业管理局和省电台建立革命委员会。省军区对这些行动均表示支持。⁵3月29日，湖南省方面草拟了《夺权公告》，向中央上报了“三结合”名单。

“大联合”和“三结合”在各地同步推进。衡阳2月中旬即已成立“衡阳地区革命造反勤务委员会筹委会”。2月25日，“衡阳地区革命造反勤务委员会”宣告成立。3月初，该委员会改名为“衡阳地区革命委员会”（简称“衡革会”），群众组织或自愿或被迫宣布解散，以表明拥护毛主席指示和听从省军区指挥。3月10日，“衡革会”发出撤销“湘江兵团”的公告。“湘江兵团”表示拥护“衡革会”的决定，该组织工作人员除一部分参加“衡革会”，其余立即回原单位，派驻一些单位的监督小组和联络站全部撤销。3月24日，“衡阳造反有理军”发表公告称：“从即日起撤销我军各总部、指挥部、联络站。我军是我市最大的革

¹ 《关键在于大联合》[N]. 人民日报, 1967, 1(30)

² 最初的“联合”口号是说“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权”，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中说“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就是这个含义。后来的提出按系统、按部门、按单位的“大联合”则带有消解跨单位群众组织的意味。

³ 文辉抗, 陈清林, 李万青. 湖南五十年大事记述[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0: 131-132.

⁴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省志·共产党志[M].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6: 214.

⁵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省志·大事记[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 790;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省志·共产党志[M].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6: 214.

命左派组织，与湘江风雷有本质区别，而且协助过解放军镇压反革命组织湘江风雷、红旗军，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以来，始终是支持我们的。现在宣布撤销各总部（指挥部、联络站）是适应新的形势，决不是什么垮台。”¹

“大联合”和“三结合”目的在于结束夺权带来的混乱，是面对社会日益无序的应急之策，也是试图恢复秩序的努力。全国性的组织遭取缔，这些组织的成员被要求回原地区原单位。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国性组织的通告》指示：“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和各地出现了许多所谓全国性组织”，“所谓全国性组织，中央一律不予承认，所有这些组织应当立即取消。他们的成员应该立即从北京等地回去，到原单位参加运动。”²2月15日，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取缔一系列全国性组织，宣布“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全国灭资军造反团总部、全国国营农场红色造反兵团等组织，为反动组织”，“全国上山下乡红色革命造反团”、“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第一线战斗队”等”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³各地群众组织解散，按系统、按部门、按单位实现“大联合”。这一举措目的在于取消跨行业的群众组织，以恢复秩序。但是，反对省军区的群众坚决抵制这种“大联合”。

围绕对待省军区、“三结合”权力机构和对“湘江风雷”的态度，分裂以后的造反派组织矛盾重重。“高司”等拥护省军区，支持镇压“湘江风雷”，在“三结合”中占到了席位。反对“高司”的群众组织同时也反对省军区，要求为“湘江风雷”平反，因而无缘进入权力机构，主要是“井冈山红卫兵”、“东方红总部”和后来成立的“红中会”、“工联”，以及衡阳的“全国赴衡革命造反野战军”等。

省军区支持“高司”打击“湘江风雷”却使自己陷入了被动，原本希望镇压“湘江风雷”杀鸡儆猴恢复秩序，却事与愿违——保守派与造反派的对峙消除了，造反派内部却分裂了，群众组织的对立变得更加严重。“高司”成员主要是大学生，以其为核心的“省红联”未能收编大部分的造反组织，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缺乏群众基础。最重要的是中央认为权力没有真正的从“走资派”移交到“无产

¹ 应山红．雁阵惊寒：湖南衡阳文化大革命史事．（未刊稿）：188．

²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国性组织的通告》，1967年2月12日。见《文革文库》。

³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1967年2月15日。见《文革文库》。

阶级革命派”手中，因而拒绝予以承认。¹省军区和“高司”进退两难，他们所期盼的“大联合、三结合”迟迟不能实现。

【评论】

清华大学 1967 年 5 月“革命委员会”成立流产记

唐少杰

1967 年初，“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帶引号）进入了全国性的夺权斗争。根据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部署，各单位（或部门）和各地区按

¹ Roderick MacFarquhar, Michael Schoenhal,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p.170.

照“三结合”原则（即由解放军代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代表）组成文革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1966年12月经过上述“司令部”授意、出自于打倒刘少奇等需要而成立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在其出现的四个月里，因为在文革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和论战，致使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这一文革著名的群众性组织于1967年4月14日分裂为“团派总部”和“414串联会”（又简称“团派”和“414”或“四一四派”或“四派”）。对于清华大学可能出现的“革命委员会”而言，“解放军代表”由于是上级指派而没有什么争议，“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代表”由于上述分裂而无法达成两派群众的共识。而“革命委员会”问题直接关系到两派的权力地位、权力分配等，更主要的关系到两派权力的合法性即权威性与否的问题。十分有趣的是，刚刚产生不久的四派所投入的与团派斗争的“角斗场”就是这类问题。

1967年4月30日，井冈山兵团总部根据“新形势”召开扩大会议，做出了《关于建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决议》，宣布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下简称“革筹小组”）由“革命群众代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第一号人物蒯大富以及革命教职工代表、革命干部代表11人组成。兵团总部所说的“新形势”，名为文革进入建立文革权力机构的筹备和建立阶段，以及北京一些高校逐渐建立起革命委员会等，实为针对“414串联会”的成立，兵团总部竭力加快使自己的权力合法化、权威正规化的步伐，从而打击414。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的庆祝观礼活动上，毛泽东、林彪等接见了新成立不久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成员并合影留念。身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的蒯大富还把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袖章献给了毛泽东。周恩来在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员座谈时，关切地向蒯大富问起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何时成立？并答应派军代表来清华。蒯大富回清华后把上述消息传给大家，一时间兵团上下喜悦有加，出现了“毛主席关心咱井冈山人”，“毛主席给咱井冈山人撑腰，咱井冈山人为毛主席争气”等大标语。¹

5月2日，“革筹小组”开始与兵团总部一起具名行文，发出通知，于5月3日至7日集中召开全校批判大会，除了几个官样文章的内容之外，一个内容就是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这显然是针对414的。

¹ 参见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主办：《井冈山》，1967年5月25日，第50期。

对于 11 人组成的“革筹小组”，“414 串联会”根本不予承认，指出其中的所谓“革命教职工代表”和“革命干部代表”根本没有代表性，而“414 代表”只有作为上述串联会核心组成员之一的孙怒涛一人。暂居兵团总部委员而实为 414 领导人之一的孙怒涛贴出《孙怒涛严正声明》，道出了 414 的立场：“所谓革筹是没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是没有代表性的，是强加给群众的，因此它不是真正革命的，它不能筹备革委会。透过现象看本质，成立所谓‘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目的就是为了给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批判旗帜的井冈山 414 及其他革命同志施加政治压力，为草草地成立一个三凑合的班子鸣锣开道。为此，我严正声明：在政治上不承认所谓的‘革筹’，在组织上不参加所谓‘革筹’。总部的某些同志，无视于井冈山 414 及其他革命同志的尖锐批评，在分裂的道路上迈出了极其危险的一步！总部的某些同志，必须悬崖勒马，否则，由此而引起的严重后果，将由你们负一切责任！”继孙怒涛“严正声明”之后，414 一些战斗组也贴出了类似的声明。“从来急”在《关于所谓“校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严正声明》中写道：“坚决不承认‘革筹’，它对我们来说，不起任何的约束和限制作用”。这意味着公开蔑视和否定兵团总部的权威。

5 月 3 日，“414 串联会”召开第十一次大会，通过决议，不承认“革筹小组”，并在 414 小报上发表文章《彻底搞臭筹备小组》。414 “东方红 03 支队”贴出大字报《把现临筹小组一棍子打死》，抨击兵团总部搞“三凑合”、“假批判”、“改良主义”。“筹备小组娘胎里的时候心眼就不正”，要把它“搞得臭臭的，而且要一棒子打死”。

5 月 5 日，机械系成立了“革筹小组”，这是兵团总部的“革筹小组”的第一个系级分支机构。414 手下的“东方红特别支队”发出“严正声明”：“所谓革筹小组是完全非法的！是破坏大联合的！是兵团总部某些人在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道路上跨出的新的一步！是分裂的产物！我们坚决不承认！”并限令蒯大富：“立即解散革筹小组；彻底改组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广播台”……等六条。

兵团总部和“414 串联会”在革委会组建问题上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不仅双方的大字报、广播台等一时间唇枪舌剑，而且双方领导人的不妥协直接促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出面调解。5 月 12 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亲自主持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负责人和“414 串联会”负责人开会，听取清华文革有关情

况汇报，并做出有关指示。这一长达7个多小时的会议对清华文革局势并没有什么改观。5月21日下午，谢富治亲临清华大学，召集兵团总部负责人和414代表，进行了4个多小时的商谈。在谢富治的主持下，兵团总部蒯大富与“414串联会”孙怒涛签署了四项协议：

- 1、立即停止内战，不准相互攻击。广播、大字报、标语等不准攻击对方。有不同的看法须协商解决，尤其不准把内战打到社会上去。
- 2、双方要整风，主要是自我批评。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整风要达到大联合、大团结的目的，逐渐实现班、系大联合。
- 3、调整和扩大革委会筹备小组，革筹小组和总部实现我校革命的三结合。
- 4、井冈山兵团总部和革筹小组做出的决议必须执行。¹

这一决议的“要害”在于第4条，即规定414必须执行兵团总部和“革筹小组”的决议，这无疑使在此之前为414所拒斥的“革筹小组”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并很有可能把414置于兵团总部及“革筹小组”的指使之下。

当日晚，兵团总部召开其各系、处分部的大会，传达了“四项协议”，兵团上下欢呼雀跃，各分部纷纷发表响应、支持“四项协议”的“严正声明”。

差不多与此同时，“414串联会”核心组等召开且会议，严厉地批评了孙怒涛的“妥协”、“软弱”，孙怒涛在会上作了“检查”，承认“丧失原则”，“对不起广大414战士”。414核心组部署抵制“四项协议”的行动。这一核心组的汲鹏等19人发表声明，反对“四项协议”。414广播台一直广播到深夜，大加抨击“四项协议”。次日，“414串联会”勤务站发表声明，评论“四项协议”，认为可“同意第2、3条协议”，“第4条议……严重违背毛泽东思想，我们坚决反对”。414的核心队伍“东方红战团”发表声明说：“5·21的四项协议是414革命串联会勤务站部分同志违背414广大战士的意愿，没有坚持原则，擅自达成的，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战团坚决不予承认”。到此时为止，414的近百个战斗组发表声明，拒绝“四项协议”，声称“现革筹必须解散”。

尽管兵团总部为了加快成立“革委会”而同414代表坐到一起谈判并签署协

¹ 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主办：《井冈山》，1967年5月25日，第50期。

议，这实际上等于承认了414的“合法性”，但是，“414串联会”可谓“变本加厉”，不仅不承认“四项协议”，而且公开地无视谢富治以及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权力和权威，这也就意味着清华文革两派的问题解决已不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力所能及的了。

5月23日凌晨，谢富治指示他的办公室人员分别打电话给孙怒涛和蒯大富，电话内容如下：“那天谢副总理与你们双方协商达成协议的几条，谢副总理已经报告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同志。谢副总理说，你们坚决执行四项协议，这样作对你们有好处。”同日上午，蒯大富在兵团总部和“革筹小组”会议上作了传达，并再次宣读了“四项协议”和扩大后的“革筹小组”名单（由原先的11人扩大到22人，增加了四派人员的人数）。

同日，在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召开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大会上，谢富治向邻座的蒯大富转告了他昨日向毛泽东汇报有关情况时提到清华大学的情景。谢富治说：“昨天，我见到了主席，我将四项协议向主席作了汇报，主席表示赞成。我又向主席讲了清华问题解决三种途径：第一条蒋南翔回来；第二条井冈山总部和蒯大富下台，414上台。”毛泽东听后说：“这两条都不行”。谢富治对蒯大富说：“我又说了第三条，还是两派联合起来”。毛泽东笑着对谢富治说：“你又和稀泥”。¹蒯大富听了谢富治的这一“转告”后喜悦不已，回校后，他多次逐句逐字、绘声绘色地传达了谢富治的“转告”。

5月24日上午，兵团总部连忙召开大会，蒯大富再次讲述了昨日谢富治传达的话语情景，顿时会场上一片欢腾。兵团上上下下都认为毛泽东是支持井冈山兵团总部而批评414的，纷纷表示，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尽快尽早地成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一传成讹，清华园内贴出了“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414上台不行！”的大标语。一时间，昨日收到了谢富治的电话“指示”，今日传言的“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弄得414上上下下，满头雾水，大惑不解，不少战斗组纷纷改口拥护兵团总部及“四项协议”，一些群众还声明退出414，只有少数领导人坚持原来的立场。414代表前去找蒯大富对证，蒯大富说没有上述“最新最高指示”并且答应在有关会议上纠正一次，实际上却听之任之。经兵团总部的《井冈山》报报道蒯大富的“传达”，毛泽东的所谓上述指示流传更广。

¹ [参见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主办：《井冈山》，1967年5月25日，第50期。]

无疑，谢富治的“转告”对兵团总部加紧成立“革命委员会”给予了很大的促动。5月24日晚，在兵团总部召开的整风大会上，蒯大富宣读了由兵团总部和“革筹小组”做出的关于在5月30日以前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决议和紧急动员令，并宣布了革命委员会成员的提名名单。自此之后，兵团上上下下鼓足干劲，准备在5月30日之际建立清华大学文革的正式权力机构，即以兵团总部为核心的“革命委员会”。兵团总部的此番热切愿望和急切心情溢于言表：“动员起来！……克服一切阻力，踢开一切绊脚石，拿出十二分干劲，下定二十四分决心，运用四大武器，昼夜奋战，分秒必争，全力以赴，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一定要在5月30日以前成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¹兵团总部一位领导人还在5月27日的一个会议上说：“30日不成立革委会就不算真正的井冈山人。”

5月24日下午，“414串联会”在化学馆三楼召开大会，讨论上午蒯大富传达的谢富治的“转告”和所谓毛主席关于清华问题的“最新最高指示”，商量对策，要求中央有关部门拿出关于毛主席“指示”的正式文件。次日，该串联会决定停止选举清华革命委员会成员，宣布414不参加任何有关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筹备活动，他们准备以从兵团分裂出去另立“山头”的事实，来制止团记“革命委员会”的出世。414一位领导人还宣称，要与兵团总部血战到底，一年以后看眉目。对兵团总部的目前筹备活动，采取不理睬的方针，一年以后算账。在当日晚414下属的“东方红战团”举行的会议上，与会者们决定“阻止蒯大富成立革委会”，“只要蒯大富成立革委会，有了法定权力，他就会下令解散414，群众也就顶不住了。”“无论如何，要在革委会之前另外搞一个总部，否则（414）队伍也拉不出来了。中央一承认，谁也不敢分裂了。”“我们要用分裂来阻止革委会的成立。我们要拉出一支队伍。中央看到分裂，也许不会承认在一派基础上的革委会，这是一线希望，要争取。”其领导人还说：“在东方红战团中挑出50个出身最好、没有任何问题的老造反派，这50个人不怕压，不怕中央打棍子，不怕牺牲，毫不动摇，死抱一团，长期对抗。中央打棍子，我们一起顶上去，要抓一起抓，要死一起死。”5月26日上午，“东方红战团”在圆明园遗址处开会，该战团的大部分成员参加，其领导人宣布了与兵团总部分裂的决定。针对有些成员担心中央批评闹分裂，该领导人说：“我们是蒯大富网中的鱼，现在网越收越紧，不是鱼

¹ 同上。

死就是网破，只有冒死一拼了！”会议决定分裂下去。同日下午，在清华主楼三区3楼召开“东方红战团”大会，讨论并通过了有关分裂的宣言。27日晚，在同一地点召开了“东方红总部”成立大会，以示与兵团总部分庭抗礼，决不妥协。会上，依然有一些人不赞成决裂。这时，会议主持人传达了由一些相对中立或温和的群众组成的“三七战团”愿意加入从兵团分离出来的414队伍。会议遂决定成立一个正式总部。次日，先是在圆明园遗址处召开会议，讨论新总部成立宣言，后于清华校内新水楼320室开会讨论总部及有关文件，414核心组决定于5月29日晚22时成立“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414总部”。¹

针对5月28日晚兵团总部和“革筹小组”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革命委员会成员名单，414广播台在仅过了几个小时，于5月29日凌晨播出“414总部”成立的消息，并播发了成立宣言，宣言指出：“兵团总部已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了”。从即日起，清华大学出现了两个正式对立的文革群众组织总部：井冈山兵团总部和井冈山兵团414总部。在同日于新水楼320室举行的414核心组会议上，与会者讨论周恩来可能来清华参加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一事，其主要领导人发言：“一切都搞好了，不能再变了！周总理来了，我们也得分裂，除了分裂没有出路！”多数与会者同意分裂。当日晚，“414总部”成立后的第一个声明就是否定有毛泽东曾批准过由谢富治主持达成的清华两派“四项协议”一事，为自己的分裂寻找理由。四派手下一些战斗组对于分裂有不满意意见，而另一些战斗组声称，这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兵团总部的革委会筹备活动正在紧锣密鼓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至少在5月30日之前，种种致辞、场景、程序和仪式等已按部就班。

5月29日19时许，蒯大富等一行数人前往人民大会堂，邀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参加次日举行的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蒯大富等进入人民大会堂后得知周恩来正在进行有关接见、谈话，蒯大富写了一个便条，请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有关人员转交周恩来，便条如下：

敬爱的总理，你好！

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将于5月30日成立！

¹ 参见沈如槐著：《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香港：时代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151—155页。

您在5月1日和5月23日曾两次答应我们一定来参加我们的成立大会，我已经把这天大的好消息告诉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全校革命师生员工万分高兴，急切地等待这一天的到来！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们敬爱的总理即将第三次参加我们学校的大会，也是第一次参加我们井冈山掌权后的大会！

总理这一次无论如何要抽出一点时间参加我们的大会。总理参加我们的大会将对我校文化大革命和北京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产生巨大的影响！

总理如果不去，我们没有办法向群众交待，明天的大会将无法开下去！

急切盼总理回音！！

我们很想与您交谈几分钟，我们在门外等着！

等！！一定要见！！！！

蒯大富 5.29¹

此便条文中的着重线为蒯大富亲自所加，明眼人不难看出其中的两个重点：周总理将“第一次参加我们井冈山掌权后的大会”和“总理如果不去，我们没有办法向群众交待，明天的大会将无法开下去！”

一会儿，向周恩来转交蒯大富便条的工作人员回来，交给蒯大富一张周恩来的回条，回条全文如下：

蒯大富同志：

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要在大联合的基础上召开，才合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原则。

现在听说你们革命派还没有联合起来就宣布开会，我们就不好参加了。谢副总理正为另事约见红代会谈话，请就近解决。

周恩来²

周恩来的答复对于蒯大富以及整个团派不啻为晴天霹雳。显然，周恩来对于在清华文革造反派分裂的情况下成立革命委员会是非常不满的，也是十分鲜明地

¹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0169。

² 出处同前。

不同意由团派执掌清华革命委员会大权的。周恩来对清华文革的形势和动态了如指掌。周恩来拒绝参加“团记”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至少从形式上讲，算是断送了团派的最大美梦。今天看来，周恩来不参加上述大会，不是临时决定，而是事先就决定下来了。因为，当蒯大富等人赶紧寻找谢富治时，正在开会的谢富治抽出身来对蒯大富等人说：“我给总理打电话了，总理说坚决不参加这个大会，叫我也不要参加。总理说，让他们联合好了，我们才参加。既然总理不参加，我也不参加。我给你们写封信，就说总理没空，推迟成立，给你们一个台阶下好不好？”蒯大富一度执意要召开大会，坚持成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谢富治让蒯大富自己考虑、决定。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考虑，蒯大富决定暂不举行成立大会。谢富治让蒯大富自己起草一封“推迟信”，蒯大富写完后，谢富治看后让工作人员抄写一遍，并签了名，以便蒯大富回清华有个“交待”。该信如下：

蒯大富同志并转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你们今天成立革命委员会，我请示了周总理，周总理对你们学校运动非常关心，他要参加你们的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但是总理近几天中央工作特别忙，今天不能参加你们的成立大会，总理建议你们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往后推迟几天，请考虑。

谢富治

1967年5月30日¹

5月30日凌晨2时许，蒯大富等返回清华。蒯大富大哭一场，说：“总理给我们当头一棒，又加盆冷水”。3时许，团派广播台广播了谢富治致蒯大富和“革筹小组”的“信”，以及推迟召开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的“通知”。²

5月31日，团派成立了其核心组织“六二四战团”，以1966年6月24日蒯大富等人同工作组论战的日子来命名这支队伍，旨在专门与四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也标志着团派与四派的对峙和冲突已经不可调和。

清华团记“革命委员会”的流产、夭折，无疑是清华大学文革初期史上更是

¹ 出处同上。

² 出处同前。

团派与四派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四派从井冈山兵团分裂出去到另立“山头”并给予团记“革命委员会”美梦以致命的打击，前后只有一个半月时间。在这较短的时间里，四派崛起，成为敢于向团派问鼎清华大权并角逐清华文革天地的一支重要力量。自1967年4月开始，团派与四派的对立直至1968年春夏的生死之战，给清华文革初期历史烙上了浓重的群众冲突的“底色”，这种“底色”在许多方面遮掩或冲淡了1967年4月之前清华文革的种种矛盾及对抗。例如，1967年春夏开始的全国性的文革群众运动中不同派别的矛盾和冲突，已经大大超出了1967年年初及其之前的文革所谓同“走资派”斗争的主题。文革在进行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就进入了它远远始料未及的群众运动的总体内讧直至全面内战的阶段。

清华文革群众两派的分歧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如何理解和如何运作文革？具体地说，文革是所谓“彻底砸烂旧国家机器”、“改朝换代”、“大翻个”，还是“部分地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即“修修补补”？二是文革的主要矛盾是文革与走资派的矛盾，还是文革同时与走资派和“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矛盾，即文革的敌人是一个“一小撮”（走资派）还是两个“一小撮”（走资派和阶级敌人）？三是如何评价文革前“十七年”（1949年至1966年）？至少是在教育领域，“十七年”是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政”、是“烂掉了”，还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四是如何对待在文革伊始被暂时打倒或被“冷落”的清华中、基层干部？对他们是“上揪下扫，除恶务尽”，把文革当成一场“批判干部的运动”，还是积极给他们“平反平黑”，“大胆解放，大胆使用，”最终使他们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五是如何看待文革群众运动？包括文革在内的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可歌可泣的，还是具有先天缺陷和现实弊端的？等等。清华文革群众两派就这些分歧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作为文革中激进的甚至极端的群众造反派（团派）与温和的、相对保守的群众造反派（四派）的两大代表，团派与四派的这种分歧和论战集中体现了全国不同地区和部门（或单位）的文革群众派别斗争的性质和特点，具有了文革全局性的意义和影响。实质上，概括上述分歧，我们就会看到：第一个方面关系到文革是否是一场所谓涉及到社会制度根本变革的“大革命”；第二个方面关系到所有与文革直接相关的人士的利益格局，特别是这种格局与文革前的利益格局的关联，换言之，文革是否为文革前的政治运动的继续和重演；第三

个方面关系到文革开展并深入下去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的问题，即文革是否是对文革前“十七年”的全局转换；第四个方面关系到在文革进行过程中谁占主导地位 and 谁发挥主要影响，亦即关系到群众运动是否会重新转化为原有的广大干部所“主宰”的运动；第五个方面关系到文革群众运动的出路，亦即关系到群众运动的兴衰和成败与否。这些分歧和论战的深刻和重大实际上意味着文革的走向和命运。同样，这些分歧和论战所具有的破绽、荒唐也是由文革整个理论的荒谬和文革整个实践的异化所带来的，并且反映出这种理论和实践的衰败和破产。¹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种分歧和争论都是与文革群众在文革之前和文革之际的切身利益及其格局密切相关的。这种分歧和论战体现在清华“革命委员会”筹备的全部活动中，就直接成为利益之间的交锋和利益格局之间的混战。成立一个由什么样的人所代表或所主导的革命委员会，不仅仅关系到文革某一特定群众组织的权威和力量，更加关系到不同群众的切身生活。同样基于文革群众斗争的原则和方法，对于清华文革群众两派的权力争逐而言，几乎没有什么妥协的可能和退却的余地。这两派都把文革群众斗争的“两个凡是”原则，即“凡是对立派群众所试图达到的，就一定要阻碍、破坏；凡是对立派群众所阻碍、破坏的，就一定要力争达到；”淋漓尽致地推向了极端。例如，清华文革两派各自内部的“鸽派”在革命委员会筹备问题上一度曾有的种种妥协尝试，无不为自己组织中“鹰派”的极端行径所否定、所推翻。

到了1967年底，四派的工作之重点已不仅仅是给清华广大原干部平反、平黑，而是竭力使他们加入清华文革的运转甚至决策之中。最明显的一点是，四派不断从广大原中层干部中“物色”年富力强并具有代表性的人员准备进入将要建立的清华文革领导班子，例如，在1968年初给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的报告中，四派总部建议：未来的清华革命委员会常委中，至少应该“结合”过去清华党委成员8—10人以上，并且最好是由原清华中层干部的代表人物担任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主要领导人的职务。

1967年底至1968年初，团派与四派的关系已不同于半年多前两派分裂之际，双方由过去主要是认识分歧和观点论战转移到了实际的对抗和冲突。双方围绕着干部问题以及权力问题的斗争逐渐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正是在这个时期，四派

¹ 参见唐少杰著：《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90—219页。

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强调指出：“革命小将不能执掌未来的革命委员会大权”。2月23日，四派总部在向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提交的简报中明确提出：由革命小将担任未来的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第一把手是不适宜的。言外之意，也是不会为四派所接受和所认可的。对于团派而言，四派所大力推荐和倚重的干部势力，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而，削弱四派力量的主要途径就在于加大打击清华原干部队伍的力度，反过来说，亦然。于是，团派1967年底掀起了新一轮整治和迫害清华原中、基层干部的高潮，而这次行动致使两派彻底走向武斗。

团派和四派主要围绕着如何对待干部问题的论战，到了1968年春季，已经不可能在思想上和字面上得以解决了，终于在同年4月23日至7月27日进行了闻名遐迩的“百日大武斗”。其中，5月30日，为“纪念”一年前团记“革命委员会”的流产并向四派报仇雪恨，团派在清华东区学生宿舍、食堂和浴室聚集的地带，发动了清华文革史上最为惨烈的大武斗。从凌晨三时开始（为“纪念”一年前同一时刻团派广播台播出了周恩来不能来清华参加革命委员会成立活动的消息，一说矛头指向周恩来），这次大武斗进行了近11个小时之久，动用了土坦克、土炮、炸药包、轻机枪、步枪、长矛、大刀、箭矢、弹弓车、燃烧瓶、硫酸瓶、石灰瓶等等，两派群众还进行了殊死的肉搏战，致使3人死亡，近300人负伤。¹文革群众运动的“文攻”几乎无一能够逃脱“武卫”（实为武斗）的下场，这也就从根本上敲响了文革群众运动的丧钟！众所周知，在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中”，约有18人被打死，1100余人被打伤，30多人终身残疾，巨大的经济损失难以确切估计。

在“百日大武斗”进入白热化之际，团派报纸发表文章指出：“清华问题是北京高校中一个老大难问题。清华大学是北京高校中唯一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大学，而目前仍在武斗。‘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皆治蜀未治’。北京未乱，清华先乱，北京已治，清华未治。”²清华群众两派都在这一大武斗中意识到，包括清华革命委员会成立在内的所有清华文革问题不可能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及其领导人所能解决的，他们也就对北京市有关部门多次关于制止武斗的指示或通知等不屑一顾。他们把解决清华问题的最后期望投入于中共中央领导层的直接干预。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出3万余工人组成的、由他身边的警卫部队人

¹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0175。

² 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主办：《井冈山》，1968年6月18日，第149期。

员领导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直接开进清华，打破了清华群众两派左右清华文革局面的状况，给整个教育界派出了与以往不同的崭新的文革领导者，并且实际上结束了文革红卫兵运动，直至拉下了文革初期群众运动的帷幕，标志着文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清华文革群众两派在围绕着清华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筹备进行斗争之际，万万没有想到，在他们的斗争之后所带来的1969年1月成立的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已经不是由真正的清华人所领导和所组成的，这个革命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和一半左右的成员都是由非清华的上述工宣队人员所构成，一直到文革结束，这个革命委员会都是清华大学的外来“主宰”之一。而清华文革两派群众自己也从文革的推行者变为文革所“再教育”、“再改造”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清华文革群众两派进行的权力争逐，与大多数的文革群众斗争相似，的确是自我异化的。

【访谈】

复旦文革“太史公”徐振保先生访谈录

樊建政

主访人按：徐振保，1962年考入复旦大学，就读历史系历史地理学专业；1966年文革伊始即悉心收集复旦，乃至上海、全国的文革资料。1966年12月以史红战斗组名义着手整理、编撰复旦文革资料，1968年7月告竣；1997年6月

将其捐赠复旦大学档案馆。

主访人：樊建政

受访人：徐振保

受访时间：2011年12月30日

受访地点：上海市嘉定區徐振保家

我，安徽歙县人，1943年出生于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者家庭（父亲是小商人，生活艰辛但还算过得去）。这个家庭成分给我后来的成长带来很大压力。

因为喜欢文史，1962年考入复旦历史系，庆幸可以吃“皇粮”，谈不上什么远大抱负。复旦的人文熏陶使我有了点历史眼光，具备了初步的研究能力，特别是开始懂得了人生价值，立志要做一个与家与国与民都用的人，这决定了我的
人生走向。

一、收集复旦文革资料的缘起

文革之初，我就意识到文革可能将成为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运动。鉴于解放以后文革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留给研究者可供研究的历史资料中反映社会基层鲜活、生动场景的实录资料比较少，然它们又非常有价值，我就萌发了要记录作为基层社会参与政治运动的微观图景的想法，并认定保存地方档案、资料肯定是有意义的，否则这些资料必将随着岁月流逝而无痕于人世。

后来的事实证明，因为复旦是上海文革风暴的中心，是上海文革运动的风向标，反映着上海文革运动的总趋势，复旦文革在上海具备典型意义，收集复旦文革资料的意义更显非凡。

以上所述可以说即是我当年耐住寂寞用心搜集、编撰复旦文革资料的因由。

二、“不许造反”，我只好忠实做个复旦文革的记录人

1966年5月底，我随从本班同学结束上海市横沙岛“四清”运动回到学校。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复旦贴出大

字报，运动开始如火如荼。

1966年8月18日晚8点，毛主席在天安门首次接见红卫兵消息一广播，我们班级约10多位同学就拉上我一起造反，并通宵达旦写出了我们造反后的第一批大字报。事后，与我要好的班级团支部书记就来找我，抓住我出身不好的软肋，要我认清方向，还举了1959年“反右”斗争的例子，告诫我不要滑向“右派”。我动摇了。他要我写退出造反派的声明。我骨子里是个造反派，班上的造反派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不能做既违心又对不起朋友的事情，就取折中态度，不再参加造反派，也不写退出造反派声明。从此，我成了既非保皇派，也非造反派，更非逍遥派，而是“既关心又不直接参与的”的隐性造反派——不鲜明表示对运动的态度，不直接参与造反派的活动，但很关注文革的动态。由于游离于派性斗争之外，不参加红卫兵组织活动，我只能通过每天看大字报、抄大字报，以观察、判断运动的趋势。应该说我在运动中的这种角色成就了我全身心投入文革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我若继续陷于造反漩涡，恐怕很难成就后来的复旦文革资料整理工作。

由于“职业”的需要，我必须关注复旦每一天的动态，抄录每天的大字报。大串联开始了，同学邀我外出，我婉拒，坚守“岗位”。只有两次例外，1966年9月上旬，学校组织学生到北京串联，我向往北京，更向往能得到毛主席的检阅，我去了，在文革运动的中心清华、北大、团中央等处看大字报。我班在京串联同学很少游山玩水，无人去逛长城，仅仅顺道去过住所附近的北京动物园。9月15日，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完毕，我们立即返回复旦。第二次离开复旦是10月底，当时校党委借口支持“三秋”，把学生赶往农村，给学校运动降温。对此，造反派拒绝，而我选择了服从，只好委托留校同学代为记录复旦动态。期间复旦发生了“11.8抢黑材料”事件，我未亲历现场，对于资料记录是个遗憾。此后直到1968年大学毕业，我未离开复旦，未离开上海。我这个复旦文革记录人是绝对忠于“职守”的。

三、正式全力编写复旦文革资料

收集复旦文革资料是我个人行为，一开始就有些影响。关心复旦文革的人知

道，历史系有个史红战斗组在做这件事。尽管我清楚复旦旧党委是不可能支持私家修史的，但我仍希望我的工作能得到学校的支持；尽管我清楚保皇派不可能与我共事，与保皇派殊死较量的造反派也无暇兼顾此事，但我仍期盼志同道合者。

1966年12月上旬，“打杨战役”（复旦文革中所谓炮打罪魁祸首杨西光，又称“打杨战役”）胜利，党委倒台，造反派掌权。我认为我为复旦文革存史也是为造反派存史，造反派肯定会支持。于是，我就在复旦“南京路”大字报栏贴出筹建复旦文革文物资料征集小组的大字报，果然召来造反派的响应与大力支持，他们提供给我复旦10号楼的一大间房子作为文物征集小组的活动场所，用于存放收集到的报刊、传单等资料。造反派还将旧党委大字报组积累的一批资料转交过来。这批文革初期的资料非常珍贵。编写复旦文革资料所需钢板、蜡纸、油墨、油印机、纸张，要多少供应多少。造反派还关照学校出版科提供相关服务。鉴于资料多达上百万字，刻印成为一大难题。应我的要求，在刻写蜡纸的过程中，造反派还抽调了当时在复旦已经靠边站、冲扫厕所的反动学术权威来刻写印刷。这些人很乐意，刻写认真，字迹漂亮工整。吴杰刻写的《大字报选编》和《大事记》如同铅字印刷，在当时来说堪称精美之至。

文物征集小组成立之初有四、五个人。只因工作琐碎繁杂，需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方可，加之我们这些年轻人，天性好动，做冷板凳又不如“冲冲杀杀”那般豪迈、“革命”，一个个都相继离去，“史红战斗组”最后也就只剩下我这个“光杆司令”坚持“战斗”到底。

编写复旦文革资料，我觉得最紧要的是编好《大字报选》。这是最重要的部分。其中最伤脑筋的是哪些大字报该入选？当时，我认为“编入什么”的问题不能由我独断，而必须集思广益方能得到各方面认可，并最大可能地反映运动全貌。我思考再三，决定：第一步于1967年2月以史红战斗组名义在复旦大字报栏贴出编写《大字报选》的告示，广泛征求意见；第二步在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初步拟定篇目，张贴公示，再次听取意见。入选的大字报主要是出之造反派的有重大影响的大字报，同时编入保皇派的重要大字报作为造反派大字报的附件随附其

后。此后，经过一番公开征询与筛选，大字报篇目最终敲定并立刻刻写油印。1967年4月以“史红战斗组”名义在校内出版的《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字报选》第一、二辑合订本，收录自1966年6月20日至12月26日间造反派的大字报66篇，保皇派的大字报22篇，合计88篇。《大字报选》的这个初版本发行后，我又广泛听取了群众意见，于同年5月份作了修订，内容略有增删，最为重要的变化是在每一篇前加了“按语”，写明该份大字报的背景和影响，以助后人方便理解与研究。1968年4月，《大字报选》第三辑编撰完毕，其内容从1966年12月“炮司”（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简称“炮司”）“工学运动发刊词”开始，截至1968年1月25日张春桥在复旦校革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共计64篇。

这三辑《大字报选》共收录大字报140余篇，记录了复旦文革舞台上各派人物的精彩表演，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复旦文革运动的历史进程，尽现了复旦人善于文斗论战的特色。

编写《复旦文革大事记》是另一项重要任务。当时已有不少文革大事记，大都是为论战服务的，其时间局限于某一阶段，而反映文革全程的大事记尚且没有。由于我一直关注复旦运动，天天记录，所以我又以“史红战斗组”名义编成了《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大事记》从1965年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一直到1968年1月25日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复旦文革高潮时期的大事一一记录在案。我于1968年7月毕业离校的，所以就复旦校革委成立至6月份间的大事，我也简单做了后续与补写。由于我记录的均是面上发生的事情，对各派的幕后活动，即大事件深层次的内幕无从了解，所以我所编写的大事记又须研究者再行续写与补充。但，不管怎样，一个亲历者的记录之于后人研究复旦文革乃至上海文革，应该说在提供准确线索方面是有不可磨灭的价值与贡献的。如今复旦文革研究者看重这本《大事记》，就是看中《大事记》所载的准确时间坐标。

《大字报选》提供资料；《大事记》提供线索，有点有线，但都难以反映具

体事件详细的前因后果。古人编史，有种纪事本末体，可供借鉴。我就把复旦文革大事如“八·二五大串连”、“一一·八抢黑材料”等作为名词，对其始末作了简单记述。有些只有复旦文革亲历者才了解的特殊名词，如“红战友”、“南京路”，后人看起来就茫然，也需要特别解释说明。因此，我又以“史红战斗组”名义编写了《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名词解释》，除了大事件、特殊名词外，还包括文革中复旦的重要人物、战斗组，乃至文革流行语，共计129条，可以说这本《名词解释》是这套资料的一大特色。

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革的推动、演进等等都与毛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关联。那时，大家的行动指南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毛主席的讲话、著作；另一方面是“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红旗》杂志）的社论。这两个方面代表着文革的方向，因此文革中机关、团体、群众组织等无不千方百计收集毛主席言论、“两报一刊”社论以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为此，我编写复旦文革资料，当然也要千方百计收集毛主席的言论、著述和“两报一刊”社论，最终汇编成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和《“两报一刊”重要社论、报道、文章篇目索引》。《重要指示》以时间为序，自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编起，截止1968年7月，尽可能地收入了除报刊公开发表以外的在各省市区文革小报上刊登的毛主席对当地文革的讲话，共计11.3万字。这是文革中一位老百姓所能见到的“重要指示”。虽然我无法核对汇集到的这些毛主席讲话的准确性，但经历过文革的人，包括我在内，应该坚信这些东西任何人或组织是不敢伪造的。《“两报一刊”重要社论索引》附录于《重要指示》之末尾（后与2004年再次订正时独立成册）。

1968年7月毕业前夕，我心愿以偿，复旦文革资料的编撰、装订工作全部告竣。当时这套资料油印装订共500套，散发全校。

在编写这套资料的过程中，同班的郭景扬、姜云生、刘乐运等人提供了重要帮助，参与策划、看稿，有的还帮助刻写。资料封面就是刘乐运刻写的。多才的顾晓鸣赠送我两方图章，一方大的为“史红战斗组”正楷字章；一方小的“史红”

篆字章，我珍藏至今。

鉴于编撰资料之需要，所搜集资料的范围非常广泛。因此，我于编撰复旦文革资料之余逐渐积累起了大量的传单。离开复旦之前，我也做了整理并装订成册，近百册。其中，复旦的最为突出，还涉及上海各高校的、各单位的，乃至全国各地的（其中北京、青海等地的数量非常大）。当年，时代特殊，纸质资料满天飞，所搜集资料远不止这些，但无奈于我是外地人又得到外地工作，所以只好将其余的约200斤资料全部按6毛一斤卖掉。

四、复旦文革资料的保存与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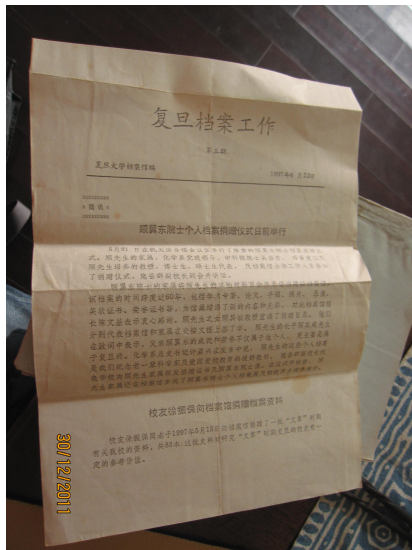
1968年毕业时，我被派往江苏省溧阳县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我积存的文革资料连同藏书装了满满十几箱，既无力送回老家安徽存放，又不可能全部随身携带。幸好我有一胡姓同乡在上海，故所编资料与图书得以分两批保存。绝大部分寄放在胡姓同乡家里；其余的如毛主席的讲话和指示部分则随身携带到了部队（后被部队无故没收）。

1970年，我由部队农场到上海市嘉定县教书，请亲戚帮忙用自行车将存在同乡家里的资料运到我在嘉定县乡下的家里。他一天一个来回，整整花了三天时间方才搬运完毕。我的这批珍宝终于得以艰难“回家”，并幸存至今。

1983年8月，复旦校史组的许存成、史家定来访，说是从历史系相关老师那里知道我编写了复旦文革资料，因编写校史需要，希望借阅。他们来人专门到我家探访，叹数量之大而不已。作为复旦学子，能为母校作点事情，我很高兴，思想很单纯，便欣然应允。两位老师见资料达百册之多，无力带走，于11月12日专门开来小轿车，留下借条，借走资料80册。这批资料在复旦乃上海的文革清查工作中起过作用。为此，1984年复旦来信来人告知可以调我到复旦图书馆

工作，甚至妻子也可调入。真是喜从天降。原来复旦党委书记见到这批资料大为吃惊，上海市清查办的领导也很震惊。要调我回复旦的就是这位党委书记，只可惜此人调任山东大学，让我空欢喜一场。对此，我并没有什么怨言。

后来，复旦领导认为这批资料保存在档案馆为宜，与我协商，我同意捐赠。1997年6月20日《复旦档案工作》第3期刊出《校友徐振保向档案馆捐赠资料》的消息，并列出一份捐赠资料清单。我特地到档案馆查看了这批资料的归档情况。档案馆还口头承诺我有查阅这批资料的权利。另外，学校为我办理了一张复旦图书馆借书证。



我手头继续保存的全套复旦文革资料，是当年复旦借阅时遗漏下来的，全部为油印本。这套资料，许多地方刻字不清，错讹难免，加之限于油印水平，有些地方连我也看不清，后人利用相当困难。2002年，我着手整理，以“总体保持原貌，原稿内容不作改动，语言文字保留文革原有特色，仅对明显的错字、标点及个别字句作修改”为原则作了重新校订，2004年7月全部完工，输入电脑并打印成册。

因为我编写了这些资料，复旦写回忆文章的人，研究这段历史的人，就来找我。2003年，复旦中文系教授吴中杰来找我看《大事记》，核实了几个重要的时间，对他帮助很大。《复旦往事》后记中专门提到了我。但，截止目前真正以研究复旦文革为目的来找我的只有你一个。

这些事情都在我预料之中。看来，我从小喜欢历史，后来以历史为专业，历史眼光还是有的。到今天为止，我出版著述三本，写过不少文章，不下百万字，但我觉得这一辈子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搜集、整理、编撰了这套复旦文革资料，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它虽然现在还难以出版，但我坚信总归有见天日的一天。也许我看不见了，我也不会感到遗憾。虽然至今这批资料至今仍沉睡在档案

馆里，但它们的价值已经显示出来。

附录之一（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总目录）：

1. 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之一：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要指示；
2. 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之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等报刊社论及重要文章索引；
3. 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之三：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4. 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之四：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字报选；
5. 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之五：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名词解释。



附录之二（复旦校友徐振保捐赠资料目录）：

- 1、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目录（史红）；
- 2、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1-44 卷）；
- 3、复旦大学文化大革命大字报选（1-13 辑）；
- 4、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字报选（1-2 合辑）；
- 5、大事汇集；
- 6、上海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
- 7、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
- 8、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
- 9、情况交流（1-263 期，全套）；
- 10、“一·二八”事件资料（1-2）；
- 11、新复旦（全套）；
- 12、红复旦（全套）；
- 13、文化大革命资料；
- 14、乘风破浪（全套）；
- 15、红色通讯（全套）；
- 16、陈传纲、徐常泰、吴常铭、徐震、张董华综合材料；
- 17、郑子文、董玉杰、葛林槐综合材料；
- 18、季玉卿、陆庄壬、殷玉芬、苏步青、余子道、刘振丰综合材料；
- 19、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名词解释；
- 20、批判集；

21、大字报选（第三辑）；

22、大字报选（第四辑）。

（本文记录整理：樊建政）

【简讯】

迟泽厚先生病逝广州

韦 陀

迟泽厚先生 1931 年生于山东莱州，1949 年 2 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 48 军，1950 年加入中共，1953 年 5 月由野战部队调中南军区司令部，长期在秘书、作战部门工作，并任黄永胜将军专职秘书。文革期间，先后担任广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副科长，广东省革委会办事组副组长，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广东省军管会办公室副主任及广州军区司令部动员部部长等职。1987 年离休。2012 年 10 月 26 日病逝于广州，享年 81 岁。

迟泽厚先生离休后，以研究中共党史、军史为职志，撰写、发表了大量重要文章。如：《林彪“一号令”发出前后》、《东野前指专列背道而驰之谜》、《广州南湖“行宫”修建记》、《中共“九大”内幕琐忆》、《我所知道的温玉成》、《卜占亚上下“贼船”记》、《质疑刘伯承元帅“批林”谈话》、《历史研究怎么样恢复历史》、《当代史阅读要去伪存真》、《关光烈谈林彪》等。

迟泽厚先生是《记忆》的忠实读者和经常撰稿人，2008 年《记忆》创刊后的第二期就刊载了他的《一腔悲愤谁诉——记丁盛同志晚年》一文。2010 年底他又将《不识时务亦俊杰——秘书眼里的黄永胜》一文赐稿本刊。今年迟泽厚先生多次与编者联系，并为本刊第 81 期《邱会作著述研究专辑》提供了重要的文章——《假作真时真亦假——质疑〈邱会作之父得罪班长挨了打〉及其他》。本刊第 83 期亦蒙其惠，得以全文发表其《一封没有照登的〈来函照登〉》一文。

今年 9 月 24 日，迟先生还为本刊发来了亲笔签字的《合约授权书》，授权编者将其发表在 81 期的文章收入《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关于文化大革命》一书之中。可惜，他看不到此书的出版了。

迟泽厚先生是军内思想解放的先驱，是学界求实求真的榜样。迟泽厚先生之长逝，使《记忆》失去一位支持者和重量级的撰稿人。《记忆》同仁谨此寄哀。

2012年10月27日

【检讨与揭发】

揭发胡乔木贩卖封、资、修黑货的一些事实

李慎之

1968-9-17

胡乔木贩卖推销封资修黑货是一贯的、大量的，不过我手头并无任何文件、记录，只能凭记忆提供一些事例。

一、胡乔木鼓吹读死书、成名成家

胡乔木一贯提倡新华社的记者要成为专家，新华社要培养“权威记者”和“权威评论家”。方法和途径是“积累知识”、“钻研”。他说过，一个人讲话生动，文章写得好，都要靠用心积累，要注意搜罗古典的、民间的语言。过去新华社一切比较高级的记者出发到外地工作前，向他请示时，他都要“谆谆告诫”他们“多读书”，甚至说“不读书无知是可耻的，别人跟你谈话，你都谈不来，不懂怎么能写出好新闻来”。他要求记者熟悉资料像专家一样（我这次抄下的一份他的“指示”里就有这样的话，这种话，他简直无时不讲），而且新闻记者根本就应该朝专家的方向努力，作为自己的“奔头”。

1948年新华社在平山的时候，曾在胡乔木的倡议下在那年秋天成立了一个资料部，集中了当时主要的骨干力量，开展研究工作。成立那天，胡乔木亲临讲话，他把研究与报导工作并称为新华社的两个轮子，“有了两个轮子车子才能走动”。至于研究工作的方向，他不但不提为人民服务，甚至与新闻工作配合都不提，干脆提出以个人成名成家为方向。他举出了一个海洋洋流学的例子，说这门学问本来是没有的，开创的人是德国的一个老船长，他每次出海都要记录下洋流的方向，最后把地图上画出了箭头，就开创了一门科学。他以此为例说明做研究工作并不困难，只要持之以恒，积年累月就可以成功。胡乔木要求资料部的每一个人都能积累资料，最后写出书来，他甚至提出新华社资料部的目标是要像大战犯王云五在抗战以前办商务印书馆时所刊登的广告那样“日出新书一本”。

胡乔木的讲话使资料部的同志人人埋头抄资料、写卡片，不过干了几个月，一点成绩没有就因为进城而解散了，没有实现胡乔木的要求。不过，以后胡乔木在讲到记者的前途时，从来不放过机会，鼓吹经济记者要成为经济专家，国际新闻编辑要成为国际问题专家，总之是只有成了专家，新闻工作者才算有了了局，其流毒是十分深广的。

二、胡乔木鼓吹做杂家

胡乔木自己以博学多闻自鸣得意，对别人也要求“博闻强记，触类旁通”。他认为要做好工作（主要就是写好文章）主要要多读书，要什么书都读。他推荐人读的书不少，我印象最清楚的是他鼓吹读希腊神话和伊索寓言。他认为文章里如果能引用上一两个希腊古典就会有色彩、有风味。他曾有一次说“美人多姿”，并且具体地解释美丽的女人不能只有一种姿态，文章也要“能备百体”，不能老是一个腔调。

胡乔木不但写文章，而且讲话都好引用中国的外国的古典，不但自炫其渊博，而且给人做一个榜样，表明应当如何“熔古今中外于一炉”。我还记得他在有一次讲如何写评论时，公然讲“孔子作春秋是话里有话”，号召人们用孔老二的“微言大义”来写文章，这是与毛主席所说的无产阶级写文章必须“旗帜鲜明”完全相反的。我还记得他有一次批评我们写的评论“比《左传》的党性还少”。这不但是比拟不伦，而且是示意人们向死了几千年的古人学习文章作法。

就我所知，1956-57年间曾推行过一套高中国文教科书，分为汉语与文学两种，其中文学部分第一课就是诗经的“关关雎鸠，……”按年代春秋战国秦汉六朝一直到五四，其内容之庞杂艰深是二十年代以后任何一套国文教科书所比不上的，试行了不到一年就因为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懂而废止了，这套教科书实际上是胡乔木授意搞的。胡乔木的“好古”“复古”已经超过了蒋介石国民党的教育部，这个问题是值得深入调查的。我因未知其详，只能提供一个线索。

三、胡乔木鼓吹“驯服工具论”

胡乔木除了在文字上与写作上大力推销封资修的黑货外，在个人“修养”上也把封资修的一套来律己律人。他也像刘少奇一样好引用孔孟的话来作为共产党员“做人”的标准（“做人”是胡乔木爱说的话）。而且不但是形式与刘少奇一样，内容上也早就贩卖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了。

1950年的七一，胡乔木曾到国会街大礼堂来向新闻总署所属各单位全体党员做过一次纪念党的生日的报告。当时，正处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有一些党员干部不安心工作，想外调，上下关系比较紧张。胡乔木一上讲台，先摆出一副基督教牧师讲道的姿势，打开《联共党史》第九章，念了第二节：“党内某些成分中间有这样一种思想，混乱状态，当然也就会有一些爱好争论的人……”和第四节：“当时必须和衷共济地进行工作”。然后就大讲其不能爱护争论而必须和衷共济的道理。惊人的是，他举出了一个例子说：“最近东北局宣传部开除了一个叫韩进的科长的党籍。其实韩进这个人也没有什么大毛病，就是老爱同领导争论，党员老是跟领导争论，党怎么能进行工作呢？因此只好把他开除了”。韩进这个人我不认识，至今也不知道他犯的是什么错误，但是既然胡乔木说他“并没有什么大毛病”，按理就不应该开除党籍。如果只因为爱好同领导争论就开除党籍，这不是原则的政策，而纯粹是“驯服工具论”，然而这却正好是胡乔木当时在主观上执行在客观上宣扬的东西。事实上，后来，新华社当时的社长陈克寒就根据胡乔木的讲话，不实行“打通思想”而实行大棒政策，压下了一批当时对他有意见的人造成了很恶劣的结果。

这次讲话结束的时候，胡乔木赠给全体党员四个字，曰“敬业、出群”，又是孔老二的话，用胡乔木的话来解释就是要“热爱工作，搞好团结”。胡乔木就是这样老是用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道德标准来混同无产阶级的道德标准。吴晗有所谓道德继承论，世人已熟知其事，但不知胡乔木在这方面的创造比他更多，流毒比他更广。

写到这里，我还想起，胡乔木有一次讲了六个字作为做人的道理。这六个字是“寡言笑，重然诺”。举的例子是“季布一诺千金”这样腐朽的东西，然而胡乔木竟然用了个把钟头来讲它如何重要，其实纯粹是唯心主义的欺人之谈。

大概在1951年或52年，胡乔木有一次在舍饭寺新闻学校讲党课，因为是胡乔木讲课，所以新华社有许多人去听了，我记得他那次是按照《联共党史》结束

语中所提出的几条标准，解释中国党何以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党。他在讲了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除了组织以外没有别的武器以后，讲中国的工人阶级觉悟如何高，农民的觉悟如何，可是最后竟一直讲到“中国的资产阶级比美国的工人阶级觉悟还要高”。最后的这一个思想完全是抹煞阶级矛盾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胡乔木的日常“讲话”和“指示”中，有许多夸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革命性的言论，使人看不到在过渡阶段，还有激烈的阶级斗争。

对民主人士胡乔木是十分“谦虚”的，我记得大概在1951年前后，对新华社这样几乎没有什么民主人士的机关，胡乔木还亲自抓了一下对统战工作的态度问题，并且提出了一个口号“礼多人不怪”，其实，当时新华社并没有什么民主人士，所谓“礼多”就是指的对一些旧报人，留用人员和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礼多”，结果使得这批人趾高气扬威风大长。

（完）

附识：关于胡乔木所推行的修正主义新闻路线，我相信材料是太多了，而且极易收集，我手头则毫无文件记录，记忆则不但十分零碎，而且都是人所共知的东西，就不写专门材料了。

（李三达提供）

【来信选登】

1、杜钧福谈 86 期唐伟文

《记忆》编辑部：

《记忆》86 期刊登了唐伟的《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一文，这是篇很重要的文章，特别是对文革前清华的特点提供了一些材料和分析，有待读者消化，但是该文夹叙夹议的文风使得许多叙事不很准确，评论亦偏重感情宣泄，可议之处甚多。阎长贵先生在《记忆》87 期已经指出其中的一些问题，但还有几处似为硬伤之处，特此献疑。

1，作者谈到他和陈育延等组织“八八”串联会，得罪了工作组，工作组派人到重庆外调他父亲的问题。查《清华大学志》，7 月 29 日工作组长叶林即已宣布工作组撤离学校，8 月 4 日和 22 日，工作组两次在全校大会上作检查。所以，在 8 月 8 日以后，工作组不可能再去外调，作者在这里没交代清楚或时间有误。

2，作者说吴德在他的回忆录中指责蒯大富是清华“八二四事件”的肇事者。查吴德唯一的回忆录《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中没有这样的内容。但他书上说蒯大富在 6 月份就提出打倒刘少奇。可能唐伟把这两件事弄混了。吴德没有提到“八二四事件”，是因为他认为这个事件不算个事。打倒刘少奇是个事，群众或基层领导受难不算个事。另，阎长贵先生来信也重复了这一叙述，似为肯定。此外，唐伟在他写的《人生原来可以这样度过》（《清华文革亲历》，邱心伟、原蜀育编，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09）中也是这样说的。

3，作者说在 9 月底，清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分裂为“八八总部”和“临时总部”。“八八总部”认为斗争重点应当是批判王光美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临时总部”认为斗黑帮是大方向，应重点批判蒋南翔和清华党委。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八八”和“八九”两派在成立时的争论焦点就是当前重点是斗黑帮还是批判工作组的错误。而“八八”派就是后来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那么，在 9 月底，这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内部两派的争论焦点和原来“八八”和“八九”两派的争论焦点有什么区别，作者应该有所交代，否则读者会感到困惑。

4, “‘北航红旗’是保工作组的, 留在了‘二司’。”似有误。北航《红旗》是持批判工作组立场的, 留在“二司”, 可能考虑到红卫兵组织是“红五类”组织, 而不计其在工作组问题上的立场。如“一司”的以汪延群为首的轻工业学院红卫兵也是反工作组的。

5, 作者说西纠“按国务院办公厅的指示把极少数知名人士保护起来, 在街道委员会和街道派出所的安排和挑唆下抄家、打人不误, 恐怖和血腥依旧。”把好事归到国务院办公厅, 坏事归到街道委员会和派出所, 仍有为尊者讳之嫌。街道委员会和派出所又受谁安排和挑唆呢? 作者所批判的吴德回忆录倒是透露一些真相, 希望作者仔细看一看。

我认为, 对文革亲历人物的回忆录的内容不必苛求。原汁原味端上来不为过。文革回忆是被回忆人思想折射过的映像, 如吴德的回忆中所表现的那样, 自有其特殊价值。但是为避免误导读者, 造成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后果, 杂志或书籍编辑应以附注形式说明与常见文献抵牾之处。

此致

敬礼!

杜钧福

2012/10/05

2、庄菁瑞赞贾明文

《记忆》88 期刊载的贾明一文, 很有价值。作者有理有据的文字展示了四中文革史的另一面, 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任何亲历者的回忆都难免受当事人立场、观点、出身、经历的局限, 因此, 要弄清历史真相, 还原文革的实际情况, 就需要广泛了解来自不同人物、不同角度的回忆。贾明的文章的意义就在这里。

2012-9-30

3、郭世杰纠正 88 期的人名

《记忆》88期《北京四中文革专辑》(三)中刊载了两篇71届3连4排的校友写的文章,其中提到该班的辅导员是67届高二年级的吴仁侃。误。一、吴仁侃应为吴人侃。二,他不是67届高二年级的,而是68届高一五班的,与赵振开、曹一凡同班。

